

## 迢迢簽約路、邊塞風土行： 清初漢臣的出使紀行及其書寫意義\*

黃郁晴\*\*

### 摘要

以明清古典文學而言，文臣武將因政治使命行走帝國邊疆的記錄在明清行旅著述中為數不少，這類著作不失為一個觀測帝國勢力消長的視角。以索額圖（1636-1703）為首，率兵千人的出使團，可視為康熙二十八年（1689）中俄雙方簽訂《尼布楚條約》之前奏曲。其中兵部督捕理事官張鵬翮（1649-1725）和兵官錢良擇（1645-1710）二人，分別寫下《奉使俄羅斯日記》、《出塞紀略》，可視為清代漢臣奉使出塞最早的記錄。欲瞭解康熙親征蒙古部落的來龍去脈，並掌握中俄簽訂《尼布楚條約》之始末，康熙二十七年（1688）由索額圖帶領的出使團，不容研究者忽略；而欲悉出使經過，從而把握清初使臣邊塞書寫之內容特色，張鵬翮、錢良擇的邊塞詩文，頗值得研究者注意。本文試圖闡述這些作品所兼攝文學、文化和歷史的多重意義。

關鍵詞：使節、蒙古、張鵬翮、錢良擇、《奉使俄羅斯日記》、《出塞紀略》

---

\* 本文撰寫期間感謝清大歷史所王士銘博士生給予蒙古相關研究資料的提點，更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惠賜寶貴意見，對本文霑溉良多，在此敬致謝忱。

\*\* 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候選人。

## 一、前言：行走到邊疆

以旅遊為研究焦點，在東、西方學界已蔚為風潮。就明清古典文學而言，近年來與其他學科進行對話不僅成為趨勢，行旅書寫記錄空間的流動，研究者透過研究對象行旅他鄉的過程中，重新審視異文化體驗過程中自我成長的變化，致使研究視域從煙雨江南到蠻荒西南、從水路、陸路到海路，隨著當今東亞研究浪潮，日本、朝鮮、安南諸國，亦進入論者的關注範圍。然而進一步觀察，有關帝國邊界行旅研究的討論似乎仍有大幅成長的空間。事實上，文臣武將因政治使命行走帝國邊疆的記錄在明清旅遊著述中為數不少，這些著述不失為一個觀測帝國勢力消長的視角，尤其明清兩代不論國力盛衰，與邊疆民族的互動始終保持密切，新疆、蒙古，或者鄰國俄羅斯等不容忽略。

邊界書寫，在中國古典文學傳統裡，以邊塞詩為代表。邊塞，指中原王朝的邊地要塞。舉凡反映或描寫邊塞戰爭、邊地風光、民俗風情、詩人遊歷、送人出塞及由邊塞問題引發的社會問題等內容的詩歌，均可視為邊塞詩。<sup>1</sup>

具體來看，有明一代士人奉命出塞的詩文著述，明成祖（1360-1424）永樂年間（1403-1424）可視為一波高潮。<sup>2</sup> 成祖欲展志在四方之氣象，除了派鄭和（1371-1433）取海路七下西洋，亦遣陳誠（生卒不詳）<sup>3</sup> 自陸路三使中亞。陳誠不僅將出使經歷寫成《西

---

<sup>1</sup> 見任文京，〈導言〉，《中國古代邊塞詩史（先秦至唐）》（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頁1。

<sup>2</sup> 見薛宗正，〈明人陳誠及其西使紀行詩〉，《歷代西陲邊塞詩研究》（蘭州：敦煌文藝出版社，1993年），頁195-196。補充說明：明嘉靖（1522-1566）、萬曆（1573-1620）期間，因邊防形勢日益嚴峻，無形促成文臣武將奉命出塞之作增多，相關邊防史地著述亦興。這方面介述，可參閱向燕南，〈明代邊防史地撰述的勃興〉，《北京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1年第1期，頁137-143。

<sup>3</sup> 陳誠，字子魯，吉水人，明洪武二十七年進士（1394）。為官曾奉命出使安南（今越南）和

域行程記》、《西域番國志》，所著《陳竹山文集》中亦留存不少邊塞詩；此外，隨成祖數次北征的金幼孜（1367-1431）<sup>4</sup> 著有《北征錄》、《金文靖集》中也留下一些塞外詩文。降及清代，清聖祖（1661-1722）治國雄心可與永樂皇帝相比擬，清初已有漢臣出征之著述，如：康熙與準噶爾戰爭期間（1690-1697）<sup>5</sup> 一些文臣武將在蒙古地區活動時留下的行紀即有宋大業<sup>6</sup>（生卒不詳）《北征日記》、殷化行<sup>7</sup>（1644-1710）《西征紀略》、范昭遠<sup>8</sup>（生卒不詳）《從西紀略》等，對雙方備戰情形、戰役經過及蒙古地區風土人情等進行描繪。值得注意的是：不論明成祖或清聖祖，蒙古與中原的互動，一直是明清邊防的要事。

---

西域，著有《西域行程記》、《西域番國志》、《陳竹山文集》等。關於生平及詩文介紹，可參閱薛宗正，〈明人陳誠及其西使紀行詩〉，《歷代西陲邊塞詩研究》，頁 195-208。

- <sup>4</sup> 金幼孜，名善，以字行，江西人。建文二年進士（1400），初授戶科給事中，成祖即位後改翰林檢討。自永樂八年（1410）起，曾隨明成祖五次親征漠北。與學士胡廣（1369-1418）、楊榮（1371-1410）相友善，有詩唱和。主要著述有：《春秋要旨》三卷、《北征錄》一卷、《北征後錄》一卷。《北征錄》、《北征後錄》，完整記錄了永樂八年（1410）、永樂十二年（1414）兩次北征的行軍路線、征途艱險、用兵方略和決戰場景。
- <sup>5</sup> 清廷與蒙古準噶爾部落的戰事從康熙一直延續至乾隆二十二年（1757）準噶爾汗國滅亡而告終。清聖祖在位時，曾三次領軍北征，與噶爾丹（1644-1697）激戰。相關研究不少，或可參閱〔日〕宮脇淳子著，曉克譯，《最後的游牧帝國：準噶爾部的興亡》（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5年）；〔俄〕伊·亞·茲特拉金（I. YA. Zlatkin）著，馬曼麗譯，《準噶爾汗國史（1635-1758）》（北京：商務印書館，1980年）；李秀梅，《清朝統一準噶爾史實研究：以高層決策為中心》（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年）；歐陽增梁，《準噶爾與清朝之關係》（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碩士論文，1993年）；張學然，《康熙帝北巡與蒙古三部落進貢考》（石家莊：河北師範大學近現代史碩士論文，2011年）。
- <sup>6</sup> 宋大業，字念功，蘇州人，康熙二十四年進士。康熙三十五年（1696）聖祖親征噶爾丹，宋大業自請運糧漠北，以功升右贊善，累遷內閣學士。《北征日記》是其康熙三十五年運糧於漠北的紀程之作。
- <sup>7</sup> 殷化行，字熙和，陝西人。康熙九年武進士（1670），在平定吳三桂叛亂中立功，任臺灣總兵，後調寧夏。康熙三十五年，聖祖親征噶爾丹，殷化行從西路軍隨征，為戰役勝利做出重要貢獻，深受聖祖賞識。《西征紀略》是隨西路軍征噶爾丹留下的記錄。
- <sup>8</sup> 范昭遠，生平不詳，據其行紀，似為蘇州吳縣人。其著《從西紀略》記其康熙五十八年（1719）清廷在漠北安設驛站及屯田的狀況。

就清初而言，順治年間（1644-1661）曾發生漠南蒙古反清事件。<sup>9</sup> 有鑑於此，聖祖即位後對待已歸屬於清的漠南蒙古、表示恭順的漠北蒙古，以及關係稍疏的漠西蒙古，<sup>10</sup> 與之互動十分謹慎，不敢大意。然而，清初邊患尚包括與蒙古若干部落保持亦敵亦友的俄羅斯。<sup>11</sup> 俄國在康熙初期勢力已擴張至黑龍江流域各地。<sup>12</sup> 面對沙俄進逼和蒙古外患，康熙在勦平三藩、統一臺灣後，隨即於二十一年（1682）以「三逆蕩平，武功耆定」、「應遣大臣，使厄魯特（即準噶爾）、喀爾喀，大加讚賞」<sup>13</sup> 名義，派遣使團深入準噶爾腹地，刺探虛實，以便調整

<sup>9</sup> 指的是蘇尼特騰機思事件和鄂爾多斯扎木素事件，前者因喀爾喀誘叛而成，後者因內地叛亂延伸所致，詳細事發經過及事後清廷的防範政策，可參閱溫浩堅，〈蒙古封禁隔離政策的形成因素〉，《清朝蒙古的封禁隔離政策》（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3年），頁50-54。

<sup>10</sup> 補充說明：清朝蒙古分為三部分，即漠南、漠北、漠西。漠南蒙古稱內蒙古，為蒙古部落中最早納入清朝版圖（分十六部四十九旗）；位置較西的漠西蒙古，又稱厄魯特，分四部：準噶爾、杜爾伯特、和碩特、土爾扈特，清初準噶爾部勢力漸大；漠北蒙古稱外蒙古或喀爾喀蒙古，並分左翼土謝圖汗部、車臣汗部，右翼札薩克圖汗部，三部以左翼土謝圖汗部勢力最強。參閱達力扎布，《蒙古史綱要》（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8、9章，頁190-252。

<sup>11</sup> 考中國、蒙古與俄國亦敵亦友般的互動，可參閱〔英〕約翰·弗雷德里克·巴德利（Jhon F. Baddeley）著，吳持哲等譯，《俄國·蒙古·中國》（北京：商務印書館，1981年）。

<sup>12</sup> 俄國對黑龍江的侵略始於崇禎十六年（1643），而清軍與俄軍第一次衝突發生於順治九年（1652），駐防寧古塔章京海塞（生卒年不詳）遭捕性冀長希福（生卒年不詳）等率兵往黑龍江，與俄軍戰，戰敗。順治年間，俄國勢力幾乎已散布黑龍江流域各地，清廷雖仍用兵，但終未能將其徹底驅逐出境。康熙初期俄國在黑龍江一帶的經營，已趨穩固，並以雅克薩為中心，且康熙八年（1669）俄人重建尼布楚城，與雅克薩東西呼應，聲勢更漲，勢力漸擴至東部濱海地方。東北地區是清朝肇興地方，俄國威脅愈大，聖祖為此深懷戒慮；因此，康熙十七年（1678）吳三桂死，康熙二十年（1681）鄭經去世，於康熙二十一年（1682），清廷開始為全面征勦俄國侵略者做準備。考清初俄國與清廷互動可參閱：〔俄〕娜·費·杰米多娃（N. F. Demidova）、弗·斯·米亞斯尼科夫（V. S. Myasnikov）著，黃玫譯，《在華俄國外交使節（1618-1658）》（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張維華、孫西，《清前期中俄關係》（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97年）。

<sup>13</sup> 〔清〕覺羅勒德洪等奉修，《大清聖祖仁皇帝實錄》（臺北：華聯出版社，1964年），第3輯，卷103，頁1375。

政策；又於二十四年（1685）派兵擊潰俄軍，弭平雅克薩（Albazin）城寨，隔年（1686）企圖通過和平談判方式解決中俄邊界問題。<sup>14</sup> 康熙處心積慮處理疆域外患，這一連串佈局直至康熙二十七年派遣侍衛內大臣索額圖為首、都統國舅佟國綱（?-1690）為副使的談判代表團成行，中俄邊界問題才真正步上談判之路；值得留心的是，使團途中遇上準噶爾攻破喀爾喀，以致折返回京，未能抵達目的地。這場突如其來的塞外戰事，意外引燃康熙解決蒙古外患的決心。

以索額圖為首，率兵千人的出使團，可視為康熙二十八年中俄雙方簽訂《尼布楚條約》之前奏曲。<sup>15</sup> 同行者有理藩院尚書阿喇尼（生卒不詳）、左都御史馬齊（1652-1739）、護軍統領馬喇（1674-1736），及隨行譯員法國傳教士張誠（生卒不詳）、葡萄牙傳教士徐日升（Thomas Pereira, 1645-1708）等。<sup>16</sup> 其中兵部督捕理事官張鵬翮和

<sup>14</sup> 康熙在二十四年派兵擊潰俄軍後，曾多次致書俄皇敦促俄人即速撤出雅克薩，試圖透過談判，以分立疆界、往來貿易的和睦方式，解決中俄問題。聖祖欲以外交方式，謀求迅速解決兩國糾紛，主要是為了削弱厄魯特，以保全外蒙。當時中國北部蒙古各部族，以厄魯特最強悍，其部酋噶爾丹雄驕一時，常有席中亞及外蒙之意。當清廷進兵雅克薩，噶爾丹乘機東進，令清廷深感不安。清廷深怕厄魯特與俄羅斯聯合，故欲停止中俄戰爭，以便孤立噶爾丹。而中俄《尼布楚條約》正是在這狀況下訂結的。參閱張維華、孫西，〈中俄簽訂《尼布楚條約》〉，《清前期中俄關係》，頁 85-115。

<sup>15</sup> 康熙二十八年六月索額圖再次率領大清使團赴俄，中俄雙方針對黑龍江領土問題，於尼布楚進行會談，並於同年九月七日達成協議，正式簽訂《尼布楚條約》。《尼布楚條約》是中國與外國訂立最早之條約。在中國方面，所注重的是劃界；在俄國方面，所重視的是通商。關於《尼布楚條約》原文及其相關研究可參閱：北京師範大學清史研究小組編，《一六八九年中俄尼布楚條約》（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法〕加斯東·加恩（Gaston Cahen）著，江載華等譯，《彼得大帝時期的俄中關係史（1689-1730年）》（北京：商務印書館，1980年）。

<sup>16</sup> 使團領隊索額圖是正黃旗滿州人，清初輔政大臣索尼（1601-1667）子，索曾協助康熙捉鰲拜（1610-1669），深受康熙信任和重用，而國舅佟國綱鑲黃旗漢軍，康熙親舅。阿喇尼是理藩院尚書，多年經管蒙古事務。護軍統領馬喇，熟悉對俄交涉，數次負責接待俄國來華使節團。因為談判中決定以拉丁語為中介語言，故隨行者還有兩名傳教士。又據《平定羅刹方略》所記，使團共計派八旗前鋒兵二百，護軍四百，火器營兵二百；每翼前鋒參領

兵官錢良擇二人，<sup>17</sup> 不約而同分別寫下《奉使俄羅斯日記》、《出塞紀略》，逐日記敘沿途所見聞。

《奉使俄羅斯日記》、《出塞紀略》二書，<sup>18</sup> 可視為清代漢臣奉使出塞最早的記錄。細閱二書，出使過程雖無功而返，然透過張氏描寫出發日「士氣勃勃，軍容甚盛」，以及錢氏「選精騎萬餘人」、「皇長子乘騎躬行二十里至清河慰勞使臣」等語，<sup>19</sup> 如此盛景烙印使臣眼中成為一幕經典畫面，可以想見康熙對於中俄和談之事的慎重。而這股不容馬虎的雄威氣勢，亦感染張、錢二人。在張氏日誌裡，數次提及隨明成祖北征的金幼孜及其《北征錄》，透過比附，寄寓效忠，並有意拿清聖祖與明成祖相比，筆觸隱然嗅出與前朝相較之意味。而兩人兼負考察的使節角色，在使團出塞後，因空間轉移所伴隨之文化衝擊，不只讓初次出塞的兩人在面對塞外民風的「同」與自己的「異」之間，適時修正、補充以往對邊塞的想像。更值得進一步指出的是，使臣不同一般觀光旅者，行走路線往往行經歷朝文臣武將出塞的路

---

一員，署前鋒參員一員，署前鋒侍衛二員，每旗護軍參領二員，署護軍參領六員；每翼火器營協領一員，參領一員；每旗章京一員，令都統郎坦、班達爾沙，副都統納泰、扎喇克圖率之偕往。見〔清〕佚名，《平定羅刹方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清光緒潘氏刻《功順堂叢書》本），史部，冊390，卷4，頁428。

<sup>17</sup> 張鵬翮，字運青，號寬宇，四川遂寧人。康熙九年（1670）進士。為官清廉自持，深受康熙賞識。集詩人、教育家、水利專家、外交家於一身。著有《治河記》十卷、《奏議》十二卷、《奉使俄羅斯日記》、《如意堂詩文》、《張文端公全集》等。錢良擇，字玉友，一作友玉，號木庵，江蘇常熟人。諸生，康熙間，隨大吏赴瓊州。又以隨行兵官身份，從索額圖、張鵬翮等出使俄羅斯。弱冠於京師，即負詩名，與查慎行（1650-1727）、惠周惕（生卒年不詳）等交往。編纂《唐音審體》，有《出塞紀略》、《撫雲集》。

<sup>18</sup> 本文所據《奉使俄羅斯日記》，收入《中國近代內亂外禍歷史故事叢書》（臺北：廣文書局，1964年影印民國三十五年〔1946〕上海國光社版），冊11；《出塞紀略》，收入沈雲龍選輯，《明清史料彙編初集》（臺北：文海出版社，1967年影印清道光十九年〔1839〕刻本），冊8。下文所引，均依此本。

<sup>19</sup> 分見「五月二日」條。〔清〕張鵬翮，《奉使俄羅斯日記》，頁3；「五月二日」條。〔清〕錢良擇，《出塞紀略》，頁4040。

段，所見每處遺址、廢墟或市鎮，均可視為召喚歷史記憶和回應歷朝邊塞詩人的媒介，比方：二人行經青冢不約而同寫下一些詠昭君的詩文，正是潛入時光隧道中的產物。另外，二書呈現塞外風光之餘，對於塞外晴雨不定、烈日缺水導致身體不適著墨不少。這些在衣食住行所感受的格格不入，使兩人不時萌生「不如故鄉美好」之情，因而寫下一些羈旅詩文，帶有傳統邊塞詩色彩，不失為一個觀測清初邊塞詩的視角。而出塞過程中，使團近距離遇上準噶爾與喀爾喀的激戰，兩人第一時間捕捉這場戰事，致使《奉使俄羅斯日記》、《出塞紀略》存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經由上述，欲瞭解康熙親征蒙古部落的來龍去脈，並掌握中俄簽訂《尼布楚條約》之始末，康熙二十七年由索額圖帶領的出使團，不容研究者忽略；而欲悉出使經過，從而把握清初使臣邊塞書寫之內容特色，張鵬翮、錢良擇之邊塞詩文，頗值得研究者注意。是故，本文擬聚焦討論二人在《奉使俄羅斯日記》、《出塞紀略》中之紀實詩文，以及各自所著《遂寧張文端公全集》、《撫雲集》收錄此趟出使經驗的邊塞詩文，以期企圖闡述其中所兼攝文學、文化和歷史的多重意義。

## 二、是役真奇絕：塞外風情初體驗

戊辰年（1688）八月十一日，張鵬翮返回張家口，聞水聲湯湯，不禁歎曰：「水哉！水哉！在塞外何其貴，在中原何其賤也！」<sup>20</sup> 水聲似心聲，「何其貴」既流露恍若隔世的返家之情，亦透露旅程的艱辛。可見歷時數月的出使旅程已對身心產生一定影響，而不同家鄉風土的洗禮，烙印腦中想必深刻鮮明，若錢良擇返鄉所題詩云：

<sup>20</sup> 見「八月八日」條。〔清〕張鵬翮，《奉使俄羅斯日記》，頁33。在此補充說明：據張、錢兩人所撰旅誌得知，大清使團出發日為戊辰年五月二日，八月八日歸程至張家口，八月十三日返抵京師，結束歷時近四個月的旅程。

居庸槐鬱鬱，上谷麥穰穰。過此無居室，從來是戰場。……言語需重譯，陂陀陟彼蒼。樂郊惟茂草，飽飯止炮牂。晝夜遷冬夏，斯須變雨暘。琤琮拋電彈，赤碧亘虹梁。平壤皆沙礫，編氓雜犬羊。……敗革舒為席，穹廬密作房。縫氊遮四面，植釜爨中央。馴畜環於外，周親臥在旁。馬通煨熾炭，糞溷傍低牀。夙習等非類，厥心疑不戢。初看吁可怪，漸慣或無妨。<sup>21</sup>

一幕幕追憶的塞外圖像，先是山川景物的視覺衝擊，再是語言溝通阻礙，接著是身體感官在食、住、行等的一連串刺激和體驗。顯然從旅人的視角看，這些「終生難忘」的經歷是記錄旅程點滴的重要元素，更是返鄉述說旅途驚險的故事題材，如同錢氏於詩尾云：「是役真奇絕，吾生乃試嘗，賦詩臚景物，留向故山藏。」<sup>22</sup> 究竟張鵬翮、錢良擇捕捉哪些新奇的塞外風光？眼中的新奇事是出於個人喜好？抑或兼有歷史、政治、文化的考察意義？而性情和身份不同的兩人如何記錄遼闊的塞外風光？

考使團行走之路，是出居庸關經宣府、張家口、歸化城後，入漠北喀爾喀一路西行前往目的地色稜斯克的路線，<sup>23</sup> 踏上此路不僅僅是走向陌生的塞外，也是適應游牧文化的開始。身為隨行出使的漢臣，

<sup>21</sup> 見〔清〕錢良擇，〈出塞詩一百韻〉，《撫雲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影印清雍正八年〔1730〕刻本），冊165，卷6，頁495-496。

<sup>22</sup> 同前註，頁497。

<sup>23</sup> 從北京出發，經張家口、庫倫直至恰克圖的驛道是清朝內地與外蒙古互相聯繫的主要通路，也是中俄兩國之間重要的往來道路。清朝在張家口和庫倫之間一共設有五條道路，最東邊為大東道，也稱官路，沿途設有驛站和驛卒，以供應水草。使團行走路線即官路。關於沿途驛站介述，可參閱鷹揚，《在大漠那邊：近世的蒙古與戰爭》（臺北：知兵堂出版社，2011年），第2章，頁54-58。而關於明清驛道介述，可參閱王子今，《驛道史話》（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年），頁113-128；楊正泰，《明代驛站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劉文鵬，《清代驛傳及其與疆域形成關係之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

張鵬翮即興詩一首抒懷首次出塞之情，見〈奉命出使俄羅斯口占〉：

閭闔鑾雲捧玉皇，同文盛治肅冠裳。一人有道來荒服，兩曜無私照萬方。

威播樓蘭能順命，化行西域自尊王。皇華不暇歌將父，報國丹心日正長。<sup>24</sup>

由詩題和內容觀之，出塞是為出使，出使是為「不辱皇命」，如何盡責完成使節任務是其念茲在茲之事；<sup>25</sup> 相較之下與其同行的錢良擇，這麼表露出塞心情：

黃日壓邊城，風搖大將旌。弓刀三萬騎，一騎是書生。<sup>26</sup>

同是即興詩，錢氏以「弓刀三萬騎」描繪使團聲勢浩大，藉「一騎是書生」投射自己作結。其以兵官身份隨行，於此有意強調「書生」的身份，抒發口吻明顯有別「使命在身」的張鵬翮。據此，不難推知兩人不一致的出塞心態所勾勒的風土景致定錯落有別，而張氏「不辱皇命」的慎重口吻與錢氏「一騎書生」的悠然態度，易形成一記實一抒懷的行文風格，致使《奉使俄羅斯日記》傾向以條列式為主的日記體，《出塞紀略》則以詩文體表現為多的記錄方式。

<sup>24</sup> 見〔清〕張鵬翮，〈奉命出使俄羅斯口占〉，《遂寧張文端公全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2010年影印清光緒七年〔1881〕刻本），冊176，卷5，頁382。

<sup>25</sup> 這亦能從出關當日，張鵬翮語兵科給事陳世安的話看出：「孤遠微臣，受皇上特達之知，每慚不能報稱萬一。出使絕域，正當竭力致身，以圖不辱君命。荷蒙聖滋眷注，特降恩綸，此高天厚地之所以難酬歟！」見「五月三日」條。〔清〕張鵬翮，《奉使俄羅斯日記》，頁4。

<sup>26</sup> 見「五月七日」條。〔清〕錢良擇，〈出塞口占〉，《出塞紀略》，頁4051。

### (一) 各抒其情的獵奇之筆

對於分別來自四川、江南的張、錢二人來說，塞外的地形、氣候和風物明顯不同家鄉風土，旅程所見一切無疑是一種新奇的感官體驗。然而塞外自然景致，大抵如錢良擇云：「上山岡，一山未盡，一山復出，愈登愈高，上多下少。」<sup>27</sup> 沿途景色多是「窮荒山川草木既不知其名，往蹟遺踪又冒昧不可考」，<sup>28</sup> 入漠北喀爾喀境後則「沙深倍常非內地之比」<sup>29</sup>、「黃沙蓋地，其深過尺，山巔平地厚薄略同」。<sup>30</sup> 如此有別家鄉山川的「獨特景觀」，因沿途景物單一、色調簡單，每日所見旅途風景類似，這種新奇的感官體驗在某一程度上並非一場饗宴，有時甚或可能是一次驚險旅程。

見《出塞紀略》六月二日的日程，使團入漠北喀爾喀境後，遭受流沙阻礙，據錢良擇描述：

行不數里，黃沙蓋地，其深過尺，山巔平地，厚薄略同。馬蹄踐之，簌簌有聲，深處幾不可拔。雖有駿足莫能馳騁，每一車必須數騎推挽，猶不能前。窪處軟沙尤厚，其色較白，足不可竚，有群馬誤入其中，陷蹄沒腹強起復陷，人行其中移步稍緩，亦即陷入。牧者裸身跣足疾走而前，百計取之，終不能出，至無可奈何，乃置之而去。……是約三十里，沙乃盡，意漢之所謂大漠，唐之所謂大磧，即此地也。<sup>31</sup>

這一幕在大漠中遇難、同伴相助之景，讀來如臨其中，深感其危。面

<sup>27</sup> 見「五月十二日」條。同前註，頁 4056。

<sup>28</sup> 見「五月二十二日」條。同前註，頁 4083。

<sup>29</sup> 見「六月一日」條。同前註，頁 4098。

<sup>30</sup> 見「六月二日」條。同前註，頁 4100。

<sup>31</sup> 見「六月二日」條。同前註，頁 4100-4101。

對這次意外，錢氏感受深刻，賦詩二首：

三尺黃沙蓋地浮，不分深谷與山頭。將軍若解量為米，片地須傳十萬籌。<sup>32</sup>

沙弱難勝倦馬眠，圍人奔救亦埋肩。須愁厚載多虧缺，直洞堪輿入九泉。<sup>33</sup>

詩中有畫面，畫面中有餘悸猶存之感，所刻畫比張鵬翮僅記「路有流沙二十餘里，陷沙一處，馬誤行其中，陷不得出，車輛不可行」<sup>34</sup> 來的動容深刻。錢氏著意把旅途中令人感到不安的塞外危景，運用詩人之筆轉換心情，使危險情況化為一張張讓人印象深刻的明信片，更適切表現出塞之忐忑不安心情。

出塞驚奇不僅有誤觸流沙之險，也有遇上冰雹的可能，特別是使團行走的季節為春夏之際，正是蒙古降雹最集中之時。<sup>35</sup> 據《奉使俄羅斯日記》五月十四日所記：「未刻，雨下帳，雷雨夾雹，一食頃止。」<sup>36</sup> 張鵬翮僅記下降雹時間，錢良擇則在面對雨後「嵐氣滿山」<sup>37</sup> 即興詩一首，題云：

攬轡行吟日欲斜，忽驚沙草變繁華。乾坤何處無殊色，沙漠居然饒麗花。

寒重故留春入夏，豔多渾訝霧籠霞。畫圖人面來時路，猶為香

<sup>32</sup> 同前註，頁 4102。

<sup>33</sup> 同前註。

<sup>34</sup> 見「六月二日」條。〔清〕張鵬翮，《奉使俄羅斯日記》，頁 19。

<sup>35</sup> 降雹在內蒙古地區通常在每年的四月至十月間的六個半月之內，尤其集中在六至七月份。見王文輝，《內蒙古氣候》（北京：氣象出版社，1990 年），頁 104-107。

<sup>36</sup> 見〔清〕張鵬翮，《奉使俄羅斯日記》，頁 10。

<sup>37</sup> 見「五月十四日」條。〔清〕錢良擇，《出塞紀略》，頁 4060。

魂襯鈿車。<sup>38</sup>

透過周圍山嵐籠罩的描述，把遇上冰雹之事意象化，意外見到紅花掩映，鮮嫩如片霞之塞外美景，<sup>39</sup> 也一并寫入詩中化為詩情畫意的文本風景。可說既捕捉到張氏忽略的塞外佳景，使團行走塞外的過程亦因其描繪、觀察更顯鮮明。顯然，自比書生的錢氏比張鵬翻懂的轉換旅情，找尋樂趣，藉以捕捉塞外奇景。進一步言，錢氏此番心態也表現在對塞外特有物種的觀察，如：五月二十九日，使團行走大漠多天，張氏僅道出「辛苦倍常，人情怨怒」，<sup>40</sup> 然而對照錢氏所記：

二十九日庚子，輕陰不雨，道皆平沙，有物生類芝菌，平地蠱出長二三寸，色赤而黑，狀若蒲槌，掘地竟其根長者盈尺，類山藥，皮為鱗甲，類肉苕蓉，其味酸鹹，土人寶之，可止渴，名為鐵木耳。笋有花亦從地蠱起，無葉無枝，高不過五六尺，上為花房，圍圓徑三四寸，銳其上如未放蓮萼，四向作小花，攢簇滿之，單葉五出，色淡黃微，有香近金萱，不知其名。有小樹高才三四尺，大不逾指枝，類柳條，色黃而亮花如金雀，名哈兒哈護麻，譯語謂之金雀木，其皮以飾弓矢，堅韌且華美，塞上珍產也。<sup>41</sup>

如化為客觀的生態觀察者，企圖認識塞外特有物種，筆觸不同張氏之怨，此舉可說是其轉移身心不適的一種策略。類似生態觀察的筆觸，亦流露在塞外驚見魚、蛙形影的當下，錢氏特記「較小於中土所產者，

<sup>38</sup> 同前註，〈馬上兒臙脂草作〉，頁 4060。

<sup>39</sup> 是日提云：「至鄂託呵平阜千頃，萬山環之，水流地中廣不數尺，千迴百折自西北而東南，芳草綠縹，不見沙土，紅花蓋之，遠近掩映，鮮嫩如片霞，意即臙脂草也。」同前註，頁 4059-4060。

<sup>40</sup> 見「五月二十九日」條。〔清〕張鵬翻，《奉使俄羅斯日記》，頁 18。

<sup>41</sup> 見「五月二十九日」條。〔清〕錢良擇，《出塞紀略》，頁 4094-4095。

土人嗜之，謂其味極佳，蒙古之珍饈也」，<sup>42</sup> 透過與中原日常物產比較，使日誌具生態文化的參考價值。

從行旅角度看，面對塞外獨特地形、氣候、物產等的觀察，錢良擇的行旅感受明顯比張鵬翮細微深刻。然而若從使節的立場看，錢氏記錄略去之處恰洽是張鵬翮較為留心的地方。例舉「五月二十一日」的描述，錢良擇之筆為：

行上高嶺，名翁阿嶺，又名都楞打八，意李碑所謂捷徑故道也。直上十餘里，山石皆作五色，或赤如赭、或綠如瓜、或白如雪，黃黑間之，雖高不陡，尚可騎行，有亂石堆高數十丈，其上器械如林，有鎗刀、弓矢、鋼叉、方天戟盔甲、旌旗，旗上或畫佛、或畫虎、或畫大龜、或寫番經，凡蒙古人過此者，必攜一物置其上，叩首而後敢行。聞歸化城守土之官，春秋必以牲牢致祭，不知其何神也。既至山巔怪石插天，兩崖壁立石路一線，曲折而下如直入重泉，……如是十五里許，方至山麓，迴望天門劃然屹立，雲際鳥道縈之，忽斷忽續，忽隱忽現，絕險奇觀，化工特造，海內之所僅見，方信一夫當關，千人辟易，非虛語也。<sup>43</sup>

除了流露由想像到眼見為憑之讚嘆，行走在疑似蒙古人祭祀山川神祈之所的「敖包」(ovoo)，<sup>44</sup> 亦以「入境隨俗」的旅人心態，感受前人所留下的祈禱圖文。錢氏特別記之，如前人祭拜之跡，皆提醒其後旅人，應謹慎小心，以免慘遭不測。

<sup>42</sup> 見「五月十六日」條。同前註，頁 4064。

<sup>43</sup> 見「五月二十一日」條。同前註，頁 4080-4082。

<sup>44</sup> 敖包，是由十三座堆在山頂或比較高地的石堆。在這些石堆上，插著尖端向上的長叉、長矛或刀箭，周圍插滿樹枝，枝上懸掛各色綢布細條，從遙遠地方望過去，它會顯得非常巍峨。敖包是各個地區的地方神社，保護它們區內的人民和家畜。參閱札奇斯欽，〈生活方式〉，《蒙古文化與社會》(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7年)，頁 113。

相較之下，張鵬翻之筆完全不同錢氏，其側重在大清使者考察番邦的身份，如同「帝國之眼」，敘述所見：

二十一日，行九里，入祁連山，有土城廢址，疑即碑云旬城也。  
<sup>45</sup> 遠望石峰疊翠，入其中則平息蜿蜒。相傳元世帝后，俱潛厝此山，而不立陵墓。紅白芍藥，杏樹萱花，敷榮山阿，易險阻為坦途，豐州守張鑄之，功不可泯也。十五里踰峻嶺，方言都倫大壩，土人樹木鎗旗幟，累石積薪，其上下五里，下坡石溝崎嶇，車馬難行，加以石山壁立，溪壑幽深，師行宜慎。六十里，駐昆都勒。<sup>46</sup>

行經此地平順與否，與善於治理的官員有關；換言之，他是以使節、大清官員立場，呼應曾駐守於此的官員，從而表露相知的稱讚。因此，與治國政事相關的象徵符碼，比方：舊城廢墟、石碑等，通過它們想像、掌握所在地看不見的過去似乎比塞外奇特之祭祀景觀，更吸引其注目。於是，是日途中錢氏眼中不知何代陵寢之大墳遺跡，進入張氏筆下有一「相傳元世帝后，俱潛厝此山」的歷史線索。

顯然，面對塞外獨特的地形、氣候、物種及行走其間的旅途雜感，各懷其情的兩人敘述互有不同，各有側重；那麼，在體驗有別中原文化的塞外民風時，性情、立場不同的兩人又是如何描述？記奇之筆是否兼有歷史、政治、文化的考察意義？

## （二）文化筆記：塞外風土剪影

從地區範圍看，使團是經漠南再入漠北一路向西的路線，長期以來，生活在此的居民是過著「鞍馬為家」、「車帳為室」逐水草而遷徙

<sup>45</sup> 張鵬翻詳記此碑文，見「五月十九日」附錄。〔清〕張鵬翻，《奉使俄羅斯日記》，頁12-13。

<sup>46</sup> 見「五月二十一日」條。同前註，頁16。

的游牧生活，其社會文化在思想、習俗、生活都另成一個獨特系統，與中原地區的農業社會有顯著差別。這對不曾體驗游牧文化的二人來說，出使途中所見不同中原文化的塞外風土，既是其做為「外地人」的「獵奇」重點，亦是身為「使節」在「觀察」塞外番邦不容錯過的視角；獵奇之筆重在新奇感的描繪，而使節之眼不免帶審視、評判之筆，兩種筆觸都交錯在《奉使俄羅斯日記》、《出塞紀略》中，只是張鵬翻的風土剪影似乎較錢良擇多一些理性評述、少一些感性抒懷。

翻閱《奉使俄羅斯日記》、《出塞紀略》中關於塞外風土的記載，較集中在使團行經漠南蒙古的幾個重要城鎮：張家口、歸化城等地。摘錄「五月七日」錢良擇抵張家口的描述：

張家口下堡城周五六里，明宣德四年所築，商賈輻輳居然一大都會，大抵北邊近塞自有明三百年來，歲受蒙古之擾，干戈頻迭，戰守無時，其苦累備至。逮我朝定鼎滿漢為一，蒙古諸色上下人等，並無侵寇，出入止憑符信為驗，入塞之際有無貿易如一家人，故其居民安業日趨繁庶，不讓中原大郡也。<sup>47</sup>

身為隨行漢臣，錢氏以「滿漢為一」姿態，看待滿、漢、蒙人「如同一家」和睦相處，互通貿易共享欣榮之景況。除了述說張家口由明至清蒙漢互動關係的變化，也突顯作為長城邊口市鎮以「交換經濟」為主的發展特點，亦如張鵬翻是日所記「與蒙古易市牛羊」。<sup>48</sup> 行走於此，兩人看到了邊塞不同中原經濟的「互市」風情。<sup>49</sup> 互市，體現邊

<sup>47</sup> 見「五月七日」條。〔清〕錢良擇，《出塞紀略》，頁 4048-4049。

<sup>48</sup> 見「五月七日」條。〔清〕張鵬翻，《奉使俄羅斯日記》，頁 8。

<sup>49</sup> 補充說明的是，張家口的蒙漢互市始於明朝，據載「張家口堡，設在絕徼，極目荒涼，諸物不產。自隆慶五年北虜款貢以來，始立市場，每年互市，緞布買自江南，皮張易之湖廣。彼時督撫以各部夷人眾多互市錢糧有限，乃為廣招四方商販使之自相貿易，是為民市之始」自此漢蒙貿易由嚴格控管的「官市」貿易階段進入邊商、邊民自由議價交易的「民市」階段。而至萬曆年間，明政府建來遠堡開馬市，當時張家口互市貿易已十分繁榮。引自劉建

塞市鎮獨特的發展型態，「蒙古包」則展現了北方民族特殊的起居方式。見錢良擇以好奇眼光描述所見：

蒙古帳，見其斲木為門，頂上中空覆片毡於其外，以繩牽之，晴啟雨閉。正中疊石作竈，上加鐵圍，用以安釜熬馬通以烹飪。北置木榻，高可尺許其臥所也，衾褥皆羊皮為之。旁置一木櫝貯食用物，貧者并此無之，以革襯毡席地而已。<sup>50</sup>

蒙古包體現蒙古人逐水草而居的生活習性；其內佈局，北置木榻，按漠南蒙古習俗，北方為主人臥榻，不過床窄僅具象徵性。<sup>51</sup> 而同樣初見蒙古包的張鵬翮，則採評論的比較口吻，記下：「穹廬而居，其廬上穿一孔，中安一竈，以糞餅置廬上臭不可聞，衣敝布衣，男女同處，較中國之貧民更苦。」<sup>52</sup> 記錄如使節之筆，持中原文化的眼光看待生活其中的蒙古人，因而獨特的居住方式在其眼中，顯得不如中國貧民。大抵而言，從京城至蒙古要地歸化城之間的路程，沿途不乏皇莊與旗莊同蒙古包雜處之景，<sup>53</sup> 一如張鵬翮道「蒙古臣服，統入八旗，如行內地」。<sup>54</sup>

---

生、劉鵬生等著，〈太原市東西兩口的經濟作用：東口張家口〉，《晉商研究》（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章第3節，頁134-135。降及清代，張家口仍成蒙人進出邊口的重要關口之一，康熙初年，張家口大約有十戶對蒙古貿易的商店，不過因其位居長城邊口，形勢險要，限制其發展，多數商旅以此為轉運、接泊站地點，鮮少在此建立固定商店。參閱吳秀瓊，〈漢族在蒙古的經濟網〉，《清朝前期漢人在蒙古的經濟活動：清朝建立——清準戰爭結束（1636-1759）》（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碩士論文，1993年），第4章，頁283。

<sup>50</sup> 見「五月九日」條。〔清〕錢良擇，《出塞紀略》，頁4053。

<sup>51</sup> 參閱札奇斯欽，〈游牧文化〉，《蒙古文化與社會》，第2章，頁54。

<sup>52</sup> 見「五月九日」條。〔清〕張鵬翮，《奉使俄羅斯日記》，頁9。

<sup>53</sup> 見「五月八日」條。〔清〕張鵬翮，《奉使俄羅斯日記》，頁8。

<sup>54</sup> 見「五月十六日」條。同前註，頁11。補充說明：張鵬翮所言的蒙古，指的是漠南蒙古，漠南蒙古於1635年（崇禎8年，天聰9年）降歸後金。關於歸附經過可參閱札奇斯欽，〈蒙古的歷史〉，《蒙古之今昔》，收入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編，《現代民國基本知識叢書》（臺

歸化城，蒙語庫庫河屯，亦稱呼和浩特（意為青色的城）。據張鵬翮敘其沿革：「歸化城秦為上郡北境，漢屬五原郡，後周置永豐鎮，隋改為豐州，唐仍為豐州，又為九原郡，後唐改為天德軍，遼更名德天軍，金置天德軍節度使，元復為豐州，設知州，並倅官，而轄於大同總府。」<sup>55</sup> 從歷代行政名稱更迭，察知歸化城所在區域是一個開發頗早的邊防要地。《奉使俄羅斯日記》、《出塞紀略》中所記「萬部華嚴經塔」<sup>56</sup> 可視為一物證。據二書所記「至第七級，中空如庭，中間無物，東首壁端大書曰『大金大定二年（1162）奉敕重修』」、「嵌金世宗時閱經人姓氏」，<sup>57</sup> 透露金以前經塔已建立，而塔上不乏金元游人題署，題記者身份或某通事、某官吏、某僧侶、某庶民，<sup>58</sup> 各色人等遊歷於此一定程度反映當時北方與中原民族和平友好的事實；值得進一步留意的是，在這座「都無佛像亦無鳥雀翼巢間」<sup>59</sup> 的失修經塔上，除了留有金元人遺筆，亦間有明代題文，依錢良擇所抄：

朱朝大明國山西太原府代州崞縣儒學增廣生員段清，字希濂，嘉靖三十九年九月十五日，韃兵大舉，攻開堡塞，一家近枝（按：近枝，近親也。）六十口殺盡，止存清一家大小五口，俯念斯文一脈，留其性命，恩人達爾漢帶回北朝，路逢房叔二

北：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1955年），第3輯，冊53，第4章，頁173-174。

<sup>55</sup> 見「五月十九日」條。同前註，頁14。

<sup>56</sup> 萬部華嚴經塔，通稱白塔。塔為六角七級閣式磚塔，塔身下面砌有蓮瓣、平座欄杆和束腰的基座，是遼代磚塔的形制。這部經塔的相關研究，可參閱李逸友，〈呼和浩特市萬部華嚴經塔的金元明各代題記〉，收入盧明輝編，《北方民族關係史論叢》（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輯，頁159-175；曹永年，〈呼和浩特市萬部華嚴經塔明代題記探討〉，《內蒙古大學學報：歷史學專集》，1981年12月，頁11-27。

<sup>57</sup> 見「五月十七日」條。〔清〕錢良擇，《出塞紀略》，頁4067；「五月十七日」條。〔清〕張鵬翮，《奉使俄羅斯日記》，頁11。

<sup>58</sup> 見「五月十七日」條。〔清〕錢良擇，《出塞紀略》，頁4066。

<sup>59</sup> 同前註，頁4068。

人段應明、段茂先，又遇妹夫石枚，清妻陳氏、男甲午兒，官名段守魯，長女雙喜兒、次女賽喜兒。陳氏於嘉靖四十年四月初一病故。閏五月二十七日，妹夫石枚帶甲午兒投過南朝去了，六月初八日留名。<sup>60</sup>

題文記述山西太原段清（生卒年不詳）一家遭韃靼殺害之事跡。查嘉靖三十九年（1560）九月邊疆情勢，當時俺答（1507-1582）直搗雁門關、涼縣，破堡寨凡一百餘所，殺掠人萬戶餘，寇大同、延綏、薊、遼邊無虛日。<sup>61</sup> 題文可說印證明朝北部邊境屢遭襲擾的情況，說明當時明蒙關係不穩定的緊張情勢。令人玩味的是，段清寫下這段題文，其遭蒙人滅族又受蒙人搭救，非但未視蒙人為「仇人」，還以「恩人」稱之，而妹夫攜子「歸明」的理所當然之舉，卻寫成「投明」。如此矛盾心態，若跳脫傳統「叛逃投奔」的二元思考，段清在所謂「北朝」的蒙人勢力範圍內生活，似也在某一程度上說明當時遭掠的漢民，生活意識要比政治意識或地域意識更為突顯。<sup>62</sup> 究竟段清筆下北朝為何處？登塔追憶有沒有可能出於地利之便？回答問題前，或可從經塔所在地思索起。萬部華嚴經塔位在豐州灘上，<sup>63</sup> 嘉靖八年（1529）

<sup>60</sup> 同前註，頁 4070-4071。

<sup>61</sup> 從嘉靖至隆慶初，俺答幾乎年年南掠求貢。關於這則題文的時代背景考查，相關研究內容可參閱曹永年，〈呼和浩特市萬部華嚴經塔明代題記探討〉，頁 16。

<sup>62</sup> 據研究指出，十六世紀中葉大量漢族人口湧入豐州灘，其中有不堪負擔明朝沉重賦役的貧苦農民，亦有不滿明朝腐敗鋌而走險的邊民、士兵和白蓮教徒，以及遭蒙古人虜掠而來的漢人，這些人在此並存共處，可說已跨越夷夏之防和漢蒙對立的鴻溝，其社會生活意識要比政治意識或地域意識更為突顯。參見黃麗生，〈俺答汗的北征南掠與求貢私市〉，《由軍事征掠到城市貿易：內蒙古歸綏地區的社會經濟變遷（14 世紀中至 20 世紀初）》（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1995 年），第 3 章第 4 節，頁 191-192。

<sup>63</sup> 考「豐州灘」的歷史上，這裡是多民族活動之地，在不同時期各有其名，魏晉時稱敕勒川，隋唐時稱白道川，遼金元稱豐州灘。明朝初期，豐州灘成為明軍與北元蒙古勢力爭奪的重要地帶，明代曾在這裡設立東勝節進行管理，後因蒙古諸勢力不斷向南擴展，放棄了長城以北的地區，遂成為蒙古勢力範圍。自俺答率土默特部進入後，豐州灘改稱為土默川。參

俺答率土默特部駐牧於此以前，這裡因長期內戰摧殘，景氣荒涼，直至俺答自稱阿勒坦汗後才漸復甦。<sup>64</sup> 嘉靖三十六年（1557）俺答在此建立大板升，<sup>65</sup> 至隆慶初年明蒙建立封貢關係之前，板升聚落已是豐州灘上人口最密集的地方，其中漢人又占絕大部分。<sup>66</sup> 準此，透過經塔所在地的背景考查，段清所謂的「北朝」極大可能指當年俺答所領土默特部，其因地利之便登塔追憶。再回到錢良擇抄錄題文的當下時空思之，康熙時的萬部華嚴經塔除了呈現失修、頹壞之貌外，張鵬翻、錢良擇僅僅以一座廢土城、空城形容，亦透露經塔周圍景象蕭條，人煙稀少，不如之前行過的張家口。

進一步聚焦討論距離萬部華嚴經塔二十里處的歸化城。這座城可說是在豐州灘板升聚落的基礎上興建起來。隆慶五年（1571）明蒙和議以後，俺答為與明朝保持友好互動，也為便於控制漠南蒙古各部，遂於隆慶六年（1572）在更靠近大同（當時明蒙交易的主要地點）的

---

閔楊紹猷，〈豐州灘〉，《俺答汗評傳》（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第2章第2節，頁28-30。

<sup>64</sup> 相關討論參閱蘭璧，〈明朝後期的土默川〉，收入中共呼和浩特市委黨史資料徵集辦公室、呼和浩特市地方誌編修辦公室編，《呼和浩特史料》（呼和浩特：呼和浩特市地方誌編修辦公室，1983年），冊4，頁172-180；姚北虹，〈豐州灘的盛衰經過〉，收入中共呼和浩特市委黨史資料徵集辦公室、呼和浩特市地方誌編修辦公室編，《呼和浩特史料》，冊4，頁161-171。

<sup>65</sup> 早在俺答在此建立大板升前，小板升已從嘉靖八年直逐漸星羅棋布起來。所謂「板升」是「百姓」兩字的轉音。按蒙語發音可把板升譯作「白興」，更接近於百姓。所謂的百姓，不是指蒙古族的牧民，而是指從邊牆裏出來的明朝漢族老百姓。由於漢族老百姓來到土默川，俺答讓其修建房屋並聚成村莊居住，所以蒙古人後來把房屋和村莊都叫成板升。而大板升，也就是指城鎮而言。引自蘭璧，〈明朝後期的土默川〉，收入中共呼和浩特市委黨史資料徵集辦公室、呼和浩特市地方誌編修辦公室編，《呼和浩特史料》，冊4，頁175。而關於俺答建立大板升的討論，可參閱楊紹猷，〈庫庫河屯的修築〉，《俺答汗評傳》，第2章第4節，頁42-43。

<sup>66</sup> 見黃麗生，〈板升的出現與發展：農、牧、手工業的開發〉，《由軍事征掠到城市貿易：內蒙古歸綏地區的社會經濟變遷（14世紀中至20世紀初）》，第4章第1節之3，頁225。

大青山之南，黃河支流大小黑河之濱「仿照失陷之大都修建呼和浩特」<sup>67</sup> 歷時三年建成，特遣使由明廷賜名為歸化。歸化城，先後在俺答及其妻三娘子（1550-1612）的推展下，不僅使之成為漠南地區政治、經濟、文化和宗教中心，亦與明朝建立和平通貢、互市關係。<sup>68</sup> 據顧祖禹（1631-1692）《讀史方輿紀要》描述：

升板築牆，蓋屋以居，乃呼為升板，又眾十餘萬。南至邊牆，北至青山，東至威寧海子，西至黃河岸，南北四百里，東西千餘里。一望平川，無山坡溪洞之險，耕種市廛，花柳蔬圃，與中國無疑。<sup>69</sup>

可見明代歸化城生活環境豐足幾乎與中原無多差別。然而這般氣象隨著滿清入關，慘遭兵燹嚴重破壞，<sup>70</sup>《奉使俄羅斯日記》所述：「城周

<sup>67</sup> 引自珠嘎譯註，《阿勒坦汗傳》（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0年），頁85。《阿勒坦汗傳》，原名《寶匯集之書》，原藏內蒙古西烏珠穆沁旗王府家廟。

<sup>68</sup> 俺答興建歸化城可說是蒙古游牧社會經濟逐漸由軍事掠奪演變為和平互市的歷程和結果。關於歸化城的建城過程及其城鎮規模和結構，不在本文討論範圍，詳細研究可參閱黃麗生，〈草原城市的再現：明代歸化城的興起與意義〉，《由軍事征掠到城市貿易：內蒙古歸化地區的社會經濟變遷（14世紀中至20世紀初）》，第4章，頁211-320。而俺答妻三娘子，其為明代蒙古史上一位重要的人物，她在平定土默特蒙古內亂和維護土默特蒙古內部的統一做出重要貢獻，同時在其調解下，平息明朝與土默特部之間長達十餘年的戰爭。主張沿邊互市，促進了蒙漢人民的經濟交流。蒙古人民為感念其貢獻，又將呼和浩特城稱為三娘子城。相關研究參考李美玲，〈三娘子對明末蒙漢和平友好關係的貢獻〉，《陰山學刊》第18卷第6期（2005年12月），頁79-82；李美玲，〈三娘子四嫁順義王與明末蒙漢關係〉，《陰山學刊》第16卷第6期（2003年11月），頁67-69；韓永林，《三娘子文獻考》（呼和浩特：內蒙師範大學歷史文獻學碩士論文，2009年）。

<sup>69</sup> 〔清〕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98年），頁300。

<sup>70</sup> 明末歸化城曾遭破壞，係指天聰六年（1632），皇太極（1592-1643）和蒙古諸部聯軍出征林丹汗（1592-1634），林丹汗欲拒敵，然諸部解體，遂派人至歸化城「強驅歸化城富民牲畜，渡河西奔」，後金軍隊至歸化城區，燒絕升板而去。土默特部順義王等投附清朝，清朝於崇德三年（1638）六月，正式在歸化城土默特編設牛錄，設左、右翼二旗。見黃治國，〈試論清代在歸化城設置駐防的經濟原因〉，《蘭州學刊》第12期（2008年12月），頁136。關

圍可二里，惟倉庫及副都統署瓦屋，餘寥寥土屋數間而已。」<sup>71</sup> 可為印證；不過，若再參照《出塞紀略》所載：「城南民房稠密數倍，於城內駝馬如林，間有驢騾，其屋皆以土覆頂，貼對皆漢字窗戶精好。」

<sup>72</sup> 顯然清初的歸化城已漸現復甦氣象。<sup>73</sup>

城郭變化如此，當地民情又是如何？據張鵬翻寫道：

城南有關夫子廟，留帝誌二冊，欲使遠人知忠義也。住持漢僧關暹，有蒙古妻室，其弟子二人亦然；婦人辮髮為兩縷雙垂，而以帛束其末，帽鞞與男子同。<sup>74</sup>

這段敘述透露幾個有意思的訊息：其一，漢人信仰的關夫子廟座落歸化城內。其二，住持漢僧與蒙古女子通婚。就前者，關帝信仰的傳入與旅蒙商有一定程度的關聯，尤其自明代建城以後，歸化城互市貿易熱絡，來此經商的漢人頻仍，其中以晉商為多，晉商尤信奉關夫子，故城內有關夫子廟，做為其心靈依靠可以想見；<sup>75</sup> 除了旅蒙商因素，清代塞外各城關帝廟的興建與八旗有關，八旗兵以《三國演義》為兵

---

於易代之際歸化城的相關研究，非本文論述焦點，故略而不論，相關討論或可參見〔日〕和田清著，潘世憲譯，〈土默特趙城之戰〉，《明代蒙古史論集》（北京：商務印書館，1984年），下冊，頁701-713；黃麗生，〈清代軍政統治的社會經濟影響〉，《由軍事征掠到城市貿易：內蒙古歸綏地區的社會經濟變遷（14世紀中至20世紀初）》，第5章第1節，頁321-372。

<sup>71</sup> 見「五月十八日」條。〔清〕張鵬翻，《奉使俄羅斯日記》，頁12。

<sup>72</sup> 見「五月十八日」條。〔清〕錢良擇，《出塞紀略》，頁4072。

<sup>73</sup> 據森川哲雄研究，清初中原地區人民因饑餓和戰亂難以維生，被迫出塞求生，早在順治時期開始，漢族農民已流入蒙古地區進行屯墾。見〔日〕森川哲雄著，葉新民譯，〈十七世紀前半葉的歸化城〉，《蒙古學資料與情報》第3、4期（1985年12月），頁12-19。

<sup>74</sup> 見「五月十八日」條。〔清〕張鵬翻，《奉使俄羅斯日記》，頁12。

<sup>75</sup> 旅蒙商為從事邊境貿易活動的商人、商號和商幫的通稱，其絕大多數成員來自晉商。見盧明輝、劉衍坤著，《旅蒙商：17世紀至20世紀中原與蒙古地區的貿易關係》（北京：中國商業出版社，1995年），頁1。而關於晉商信奉關夫子研究，可參閱王守恩，〈晉商的神靈信仰〉，收入張正明、孫麗萍、白雷主編，《中國晉商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頁531-541。

書，特尊崇關羽，此一因素亦可能促成關帝信仰在歸化城的傳播。<sup>76</sup> 而住持與蒙古女子通婚的現象，體現漢蒙民眾交往已跨越政治、宗教和民族的藩籬。關於信仰風情的描述，《出塞紀略》還提供另一個觀看視角，據載：

俗最尊信喇嘛，廟宇林立巍煥非常，其製類西域之天主堂多用白布，書番經懸于長竿之上，風中飄颻若旗幟，然中一廟尤壯麗，入門金碧輝煌，爛然奪目……非中華所見，亦類西洋畫，中間一僧披黃衣袒右臂，巍然南面而坐，所謂庫土克免猶華言活佛也。其僧自言能憶數世生，身軀殼雖易其靈不昧，此僧生於臨洮之和州則猶內地，然不能漢語，詢其年纔二十有二，貌莊氣靜類有道者，無論貴賤皆免冠三叩首，謁其座前長跪。其僧用手撫其頂，以此為禮，遠近信奉若神，不知其操何術也。婦人來叩，擇其美者寢焉，次早夫婦盛飾同至座前叩謝，自此其夫不敢近恐懷佛孕也。<sup>77</sup>

暫不追究活佛的生平背景，錢良擇介說歸化城蒙古人信奉喇嘛教，以活佛為尊的信仰特色。<sup>78</sup> 而當地道教廟宇、藏傳佛教寺院林立，不僅

<sup>76</sup> 再據徐珂（1869-1928）編《清稗類鈔》「以祀關羽愚蒙」條記述：「本朝羈縻蒙古，實利用《三國志》一書。當世祖之未入關也。先征服內蒙古諸部，因與蒙古諸汗約為兄弟，引《三國志》桃園結義事為例，滿洲自認為劉備，而以蒙古為關羽。其後入帝中夏，恐蒙古之攘貳也，於是累封忠義神武靈佑仁勇威顯護國保民精誠綏靖翊贊宣德關聖大帝，以示尊崇蒙古之意。是以蒙人於信仰喇嘛外，所最尊奉者厥惟關羽。二百餘年，備北藩而為不侵不叛之臣者，端在於此，其意亦如關羽之於劉備，服事惟謹也。」〔清〕徐珂編，〈喪祭類〉，《清稗類鈔》（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冊7，卷64，頁33。另提供一說，有學者認為蒙古早期薩滿信仰盛行，關帝信仰的流傳與此信仰有關，見莊吉發，〈從薩滿信仰及秘密會黨的盛行分析清代關帝崇拜的普及〉，收入《清史論集（一）》（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7年），頁143-168。

<sup>77</sup> 見「五月十八日」條。〔清〕錢良擇，《出塞紀略》，頁4072-4074。

<sup>78</sup> 當時歸化城民信奉的喇嘛教以黃教為主。關於黃教如何傳入歸化城，不在本文討論範圍，

反映多元文化共處一地的風采，更重要的是，透過這段話還說明歸化城在俺答仿元之大都興建後，雖然經濟上強烈依賴中原，城內生活無可避免受漢化衝擊，可俺答當年引進藏傳佛教實行政教並立的政策，藉以鞏固其統治權威的手段，顯然深植當地，藏傳佛教已成當地蒙古人主要的宗教信仰。<sup>79</sup>

在宗教風情之外，錢良擇還感性賦詩多首，抒懷當地所見聞，摘錄絕句數首：

驅駝市馬語譁然，乞布求茶列帳前，但得禦寒兼止渴，生涯初不賴金錢。

塞北紅顏亦自妍，寶環珠串錦粧鮮，怪來羞脫蒙茸帽，頂上濃雲在兩肩。

馬上帷中等絮袍，腰橫襞積領緣高，卸來便寄征夫去，不待秋風費剪刀。<sup>80</sup>

字句充滿塞外色彩，一語中的道出蒙古游牧民族的生活文化、舉止穿著。誠然，面對歸化城漢、蒙文化交錯，農牧、商業經濟並行的市鎮風情，錢良擇感受如同一位受好奇感驅使的他鄉旅人，蒙古人的民族

---

相關研究可參閱金啟琮，〈呼和浩特召廟、清真寺歷史概述〉，收入呼和浩特市蒙古語文歷史學會編印，《中國蒙古史學會論文選集》（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年），頁268-285。

<sup>79</sup> 自元朝瓦解後，藏傳佛教亦失去在蒙古傳播的空間，薩滿教又成為蒙古人最流行的宗教，直至十六世紀，俺答崛起因時勢關係再引進藏傳佛教，藏傳佛教才又開始復甦於蒙古。相關研究可參閱黃麗生，《論《阿勒坦汗傳》的撰史意識》（臺北：蒙藏委員會，1997年）一書中第4章、第7章之專章討論。

<sup>80</sup> 見「五月二十二日」條。〔清〕錢良擇，《出塞紀略》，頁4085-4086。有關歸化城南蒙古人穿著，錢良擇的觀察細膩，其言：「其人男婦衣帽無別，惟婦人則以珊瑚馬腦相鑿作墜環懸耳，銳其下長寸餘，卷黑布如筒，貫髮其中，垂於兩肩，亦有耳垂兩環者，亦有項帶銀圈或數珠者，亦有紅錦作帕，或作人字分貼，項後者最重其帽，以露頂為恥。」見「五月十八日」條。〔清〕錢良擇，《出塞紀略》，頁4072。

文化，成為其獵奇記異的主要內容。

面對這座塞外城鎮，尤其它不單是漠南蒙古政治、經濟、文化中心，還是連結由內地到塞外，北越長城、貫穿蒙古，經西伯利亞轉往歐洲腹地的國際商路，視為中俄邊境貿易的重要紐帶。<sup>81</sup> 如此重鎮，無怪張鵬翻云：「歸化城，外番貿易，蜂集蟻屯，乃衝劇扼要之地，控制之法，良不可忽考。」<sup>82</sup> 正因此，當錢良擇如旅人記奇，張則以嚴肅的使臣口吻仿如稟報康熙，提出己見：

我朝威德遐暢，幅員之廣，曠古未有，即如臺灣遠在海外，亦為郡縣，應照比例，將歸化城亦設為郡縣，用府廳縣教官各一員，以寄撫遠教化之責，設滿洲將軍一員，轄現在蒙古都統。……歸化一帶土廣人稀，將死罪中有可矜疑免死之人，發往開墾，填實地方；其新設郡縣各官，照臺灣例三年陞轉，以致其奮庸之念，……應令各官於朔望日，齊集軍民，一體講讀，使知聖化；其軍民中有清秀子弟，令教官教習漢書，俟其通曉文義，亦照臺灣設科取士之例，人有進身之階，不輟絃誦之音，化魯樸為禮讓，變狡悍為忠義，莫要於此。十年生聚，十年教訓，更遐荒之區，為冠裳之地，增版宇而廣聖化，度越古帝王遠矣。<sup>83</sup>

做為受儒家思想薰陶的漢臣，張鵬翻認為塞外人民的魯樸文化若不試圖設郡縣、行教化，縱使佔領其地仍無法有效統理，於是例舉臺灣，曉以大義闡述理念，供預設讀者（康熙）參考。主張援台灣之例，從中強調「齊集軍民，一體講讀，使知聖化」，所謂「民」實留心到歸

<sup>81</sup> 見杜曉黎，〈歸化城與蒙古草原絲路貿易〉，《內蒙古文物考古》第 Z1 期（1995 年 10 月），頁 42-49。

<sup>82</sup> 見「五月十九日」，〔清〕張鵬翻，《奉使俄羅斯日記》，頁 15。

<sup>83</sup> 同前註。

化城自明中葉以降漢、蒙交雜的現象，所要教化對象不僅在地蒙古人，也包含內地遷往移墾的漢人。<sup>84</sup> 這段建議頗為中肯，然而若換個面向思考，這段話實在某一程度透露當時清廷治理臺灣的積極態度尚未落實在歸化城，<sup>85</sup> 以致錢良擇云：「番語侏離譯不明，相看都用手傳情。」<sup>86</sup> 因此張鵬翮提出教習儒家經典，透過兼習滿、蒙、漢等語文教習儒家守禮、忠義思想，懷柔對待，亦不失為一個馴服塞外民族的策略。<sup>87</sup>

綜上，顯然這趟出塞之旅，既有見聞塞外自然風光之奇，亦有與中原生活文化有別之塞外風土之奇。不管是何種新奇，這趟出塞不若想像中美好，誠如錢氏嘆道：「春風何苦渡關來。」<sup>88</sup>

### 三、迢迢簽約路：倍思鄉的驚險旅程

據同行傳教士徐日升於隔年（1689）再次出使俄羅斯的日記上，回憶康熙二十七年這趟旅程，語氣滿是無奈地說：

---

<sup>84</sup> 臺灣與內蒙古俱為清朝重要的邊疆，代表兩種不同的邊區典型。關於清廷對於兩地的政教措施討論，可參閱黃麗生，〈清代邊區儒學的發展與特質：臺灣書院與內蒙古書院的比較〉，收入《邊緣與非漢：儒學及其非主流傳播》（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0年），頁270-326。

<sup>85</sup> 順治年間，清廷曾派將軍帥師駐防歸化城，以為鎮攝。但這些措施畢竟仍為消極有限，尚不足以對歸化城的發展產生太大作用。直至康熙年間受到漠北兵事的影響才真正引發清廷加強經營歸化城的動機。見黃麗生，〈歸化綏遠的軍政建置〉，《由軍事征掠到城市貿易：內蒙古歸綏地區的社會經濟變遷（14世紀中至20世紀初）》，第5章第1節之2，頁339。

<sup>86</sup> 見「五月二十二日」條。〔清〕錢良擇，《出塞紀略》，頁4085。

<sup>87</sup> 補充說明，滿清入關前滿語是政權內部各族群的主要溝通工具，對蒙古籍官員而言，滿、蒙語言同屬阿爾泰語系；清入關後，雖以滿語為國語，但融有滿、漢文並行的包容特徵。相關研究可參閱葉高樹，〈「多元一體」政權中的文化調適〉，《清朝前期的文化政策》（臺北：稻香出版社，1999年），第1章第3節，頁41-52；以及寶玉柱，《清代蒙古族社會轉型及語言教育》（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年）之專書討論。

<sup>88</sup> 見「五月二十二日」條。〔清〕錢良擇，《出塞紀略》，頁4084。

我們在荒涼乾涸的地區困居四月之久，忍受了難以想像的痛苦、飢渴。……我們每天都不得不挖井取水。由於這些不毛之地佈滿了硝石，井水發鹹，而且氣味難聞。但是，可憐的駱駝、羊、馬卻飲若甘露。每當我們扎營，這些牲畜一發現我們開始挖掘，就立即本能地跑攏過來，希望能有水出來，供牠們解除乾渴。牠們喝起水來真是無盡無休，以致我們每天都要挖很多口井，才能供應上兩萬頭牲畜飲用。……我們吃飯時總聞到一股馬糞味，因為為了維持生活，我們不得不用馬糞當燃料。……我們的最好調味品和藥劑便是忍耐。

在我們走到離和俄國使臣議和的地點——色楞格斯克僅剩幾天路程的地方，我們得到了厄魯特人已侵入喀爾喀領地的消息。我們當時恰恰在喀爾喀人的土地上行進。我聽說，喀爾喀部首領竟然無恥地自稱為汗。依我看，他連牧羊人的稱號也不配享有。我們的欽差大臣們經過一番匆忙，但不審慎的磋商，轉身折回。幾天之後，我們的皇帝還沒有接到可靠的情報便批准了這一決定。於是，我們回到了朝廷，白白浪費了許多精力和使健康受到損害，我們費盡氣力去敲擊大門，結果卻沒能把它打開便返回了。……我們歸來以後，皇帝發布了命令。按此命令，我們的來年將再次進行同樣的「有礙於健康」的旅行，只不過是通過不同的，但是相似的地區而已。<sup>89</sup>

時隔一年，徐日升僅以兩段話追述這趟勞而無功之旅，字句盡是飢

---

<sup>89</sup> 參閱〔明〕徐日升(Thomas Pereira)著，《徐日升日記》，收入蘇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等編，黑龍江大學俄語系翻譯組、黑龍江省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所第三室合譯，《十七世紀俄中關係(1686-1691年)》(北京：商務印書館，1975年)，卷2，冊4，頁1037-1038。徐氏日記僅一頁記錄去年(1688)出使過程，該日記主要記錄康熙二十八年，出使俄羅斯並完成簽訂《尼布楚條約》的經過。

渴、驚險的忍耐畫面。

相較於傳教士的埋怨之筆，同行的漢臣張鵬翮、錢良擇，則是即刻記錄身心之不安、恐懼與疲憊，在行旅點滴中流露對家鄉風物的眷念，讀來如歷其境，深感出使旅途之不適與艱危。

### （一）水源在何處？心靈依歸在何方？

長年生活中原的張鵬翮、錢良擇，出塞約莫二週，漸顯露對環境的不適應，記錄氣候不定、無法順利取水字眼，逐日增多。雖說使團為取水、草方便，利用理藩院所設驛站，<sup>90</sup> 採「每一路分兩日行，前軍過此，後軍南至」<sup>91</sup> 的方式，並在離開歸化城後大軍分三路行走。<sup>92</sup> 可事實上，從五月至八月近四個月的行旅，正是塞外酷暑難耐之時，尤其走入黃沙大漠，水資源十分有限。面臨不時飢渴交迫，甚至不得已生吃獵物的窘況，張氏不禁嘆道「顧安所得涼茶一碗，老米飯一甌乎！」<sup>93</sup> 而「塞外風土晴則乾炙如焚，雨則沾濡以浸，求一日晴

<sup>90</sup> 理藩院的滿文名稱寫作「tulergi golo be dasara jurgan」，可譯為「治理外省的都院」，「藩」或可理解成「省」，為掌管邊陲情事的重要機構；蒙古藩部各旗歸理藩院掌理，其前身為天聰年間的「蒙古衙門」(monggo jurgan)。有關理藩院的沿革、組織職掌及其功能，文獻資料可參閱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中心編，《清代理藩院資料輯錄》（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印中心，1988年）。相關研究可參見呂士朋，〈清代的理藩院——兼論清代對蒙藏回諸族的統治〉，《東海大學歷史學報》第1期（1997年4月），頁61-97；趙雲田，《清代治理邊陲的樞紐——理藩院》（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附帶一提，清朝亦以理藩院管理對俄事務，主要包括三個方面：協調兩國的外交關係，負責兩國的貿易往來，管理北京的俄國人員。關於這部分討論可參閱趙雲田，〈清理藩院和中俄關係〉，《西北史地》第3期（1981年7月），頁108-113。

<sup>91</sup> 見「七月九日」條。〔清〕張鵬翮，《奉使俄羅斯日記》，頁27。

<sup>92</sup> 《出塞紀略》云：「索帥，帥正黃正紅鑲藍三旗，取東道；佟帥，帥三旗取西路；馬帥，帥二旗取中路，二漢臣（張鵬翮、趙世安）附正紅旗中軍仍遵出都時所定也。」見〔清〕錢良擇，《出塞紀略》，頁4088。

<sup>93</sup> 見「五月二十三日」條。〔清〕張鵬翮，《奉使俄羅斯日記》，頁16。

和爽，塏不寒不熱，未易得也」<sup>94</sup> 的氣候，行走兩月後，使團扎營不時可見「軍壘斃畜橫道」，<sup>95</sup> 行走畫面已不見威容。見張鵬翮描述：

疲馬行酷暑中，炎氣薰蒸，鞍頭如火，眼迷不能遠視，探囊取不渴丸含之；軍士有牽馬垂頭而行者，有隻身袒衣得得行者，有裸體伏矮樹下伸頸望人者，有咽喝起煙逢人乞水不得者，馬背見之，殊為惻然。<sup>96</sup>

如此「如陟火焰山，恢汗如雨」<sup>97</sup> 一路含「不渴丸」的顛簸路程，張氏出塞一個月後，已生「回想京華綠陰深處」<sup>98</sup> 的念頭，錢氏亦賦詩：「晴日炎歊逾冀北，雨餘蒸濕倍江南，我為越客居燕市，晴雨交攻兩不堪。」<sup>99</sup> 慨嘆這趟令人狼狽又疲憊的旅程。

即使兩人常心生不如家鄉之情，但欲使身心盡可能融入，完成出使任務，誠如徐日升說：「最好調味品和藥劑便是忍耐」。除了盡力適應，也隨之應變，避免病痛上身，張氏提到：

渴甚，亟取濁水一鉢，投以六一散，鵬翮、世安同錢玉友飲，如嘗玉露瓊漿矣。<sup>100</sup>

運用六一散（又名天水散），祛暑住瀉，止煩渴而行小便。值得一提的是，若說去程是摸索塞外求生的方式，那麼返程再遇取水問題，某一程度上視為「識途老馬」的經驗展示，據《奉使俄羅斯日記》七月十二日之敘述：

<sup>94</sup> 見「五月二十八日」條。〔清〕錢良擇，《出塞紀略》，頁 4093-4094。

<sup>95</sup> 見「七月二日」條。〔清〕張鵬翮，《奉使俄羅斯日記》，頁 26。

<sup>96</sup> 見「七月四日」條。同前註。

<sup>97</sup> 見「七月二十四日」條。同前註，頁 30。

<sup>98</sup> 見「六月十三日」條。同前註，頁 22。

<sup>99</sup> 見「五月二十八日」條。〔清〕錢良擇，《出塞紀略》，頁 4094。

<sup>100</sup> 見「六月十三日」條。〔清〕張鵬翮，《奉使俄羅斯日記》，頁 22。

亂石間見泉眼二處，水濁而臭，陳世安使人就近低凹處掘去數石，穴中得水不濁，後平地任掘不得水者，不審地脈故也。蓋塞外之水，往往在山脊與石穴中。<sup>101</sup>

顯然張鵬翮已適應塞外環境，水源在何處，哪裡能掘淨水已具一定判斷力。

除了尋水，一般而言，當旅人行走在生活條件不如家鄉的異地，身心狀態通常不時有欲行欲歸的糾結情緒，欲維持超乎平常的忍耐力，多會尋求心靈上的寄託。在《奉使俄羅斯日記》和《出塞紀略》裡，覺察一個有趣現象，錢良擇在異地抒發旅情，雖流露思鄉情緒，然而思念的卻是家鄉的生活氛圍，敘述口吻不見一般旅者寄予親友的對話傾訴。而時刻不忘使命的張鵬翮，旅情不若錢良擇輕鬆以對，日記中隱然窺見預設讀者是清聖祖，除此之外，關聖帝君可視為旅途中面對不安時，最重要的心靈慰藉。見其六月十日的記錄：

鵬翮疲極伏地臥息，恍忽見京邸所奉關夫子繪像，服紅袍供樓下，俄而驚覺，困頓頓釋，神采煥發。……更餘方食，而不覺其疲，使臣遠役，荷蒙神祐，皆仰賴至尊洪福所致也。<sup>102</sup>

類似記錄返程亦可見，據七月二十五日所述：

察有風信，命人釘橛，封帳後門將畢，忽風聲北來，勢如萬馬奔騰，揚塵蔽天，觸處帳幔裂飛，人聲與風聲相雜，轟轟如雷。默禱關夫子，念軍士久役於外，寒暑交侵，飢者弗食，勞者弗息，偶值狂風大作，勢必毀裂帳房，露處生災，眾命不保，祈

<sup>101</sup> 見「七月十二日」條。同前註，頁 28。

<sup>102</sup> 見「六月十日」條。同前註，頁 20。

神威息，此狂風保全三軍之命，祝甫畢，風聲漸息。<sup>103</sup>

關夫子，中原民間信仰中深受人民崇奉的神祇。忠誠、勇武形象，多次受歷朝帝王褒封，關帝廟在中原地區常是帝王將士祈求征戰順利的武廟。<sup>104</sup> 張鵬翮出使異域，面對不可測的氣候和可能客死他鄉的恐懼，透過祈禱、默念，召喚武神關公，成為在他鄉安頓身心的方式。再據其在歸化城謁關公，賦詩云：

龍沙絕塞建公祠，正氣森然仰令儀。直節可興天下士，純臣不愧古人師。

平生心事同天日，百代明禋薦歲時。聞道遐荒能報德，千秋大義重追思。<sup>105</sup>

詩中以「正氣」、「直節」、「純臣」、「千秋大義」等語，表彰關帝君之有德。歸化城內有具在地信仰特色的藏傳佛寺，張氏不祈求異鄉神靈（如喇嘛活佛）而仰賴家鄉神祇庇佑，這股離家愈遠而生強烈的心靈依託，某一程度上既拉近張氏與家鄉的距離，在異域感應神蹟、祝禱

<sup>103</sup> 見「七月二十五日」條。同前註，頁 30。

<sup>104</sup> 關羽受統治者推崇始於北宋，當時統治者面臨外患威脅，冀望借助這位歷史上有名的戰神來提高士氣，北宋和南宋時，關羽先後被封為忠惠王、武安王、壯繆義勇王等，直至明清時期上至朝廷下至民間，對關羽的尊崇達到前所未有的高潮。洪武二十七年，明太祖在南京雞鳴山興建關公廟，其後永樂元年（1403）成祖亦在北京建關公廟，之後萬曆十八年（1590）神宗加封關羽為「協天護國忠義大帝」。降及清代，早在努爾哈赤、皇太極時期，通過《三國演義》的宣傳，推崇關羽信仰，而後統一全國後，出於統治需要，更是大加推崇，追封關羽的父、祖三人為公爵。關於關羽信仰的研究甚夥，或可參閱苟波，〈道教神仙體系與明清文學〉，《道教與明清文學》（成都：巴蜀書社，2010年），第3章，頁101-115；蔡東洲等編，《關羽崇拜研究》（成都：巴蜀書社，2001年）；魯愚等編，《關帝文獻匯編》（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95年）；洪淑苓，《關公民間造型之研究：以關公傳說為重心的考察》（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1995年）；包詩卿，〈明代軍事活動與關羽信仰傳播〉，《中州學刊》第3期（2008年5月），152-155。

<sup>105</sup> 見〔清〕張鵬翮，〈歸化城謁關壯繆廟〉，《遂寧張文端公全集》，卷5，頁383。

參拜，透過書寫以示感念，無形中亦使塞外經驗、塞外大城成為傳播關帝信仰的媒介。<sup>106</sup>

使團身心上的煎熬，除上述狀況外，還曾遭盜賊夜襲，<sup>107</sup> 扎營傳言中的鬼域，徹夜怪風大響，無法安穩入眠。<sup>108</sup> 這些難以預測的情況，使人無法鬆懈心神，尤其當離開喀龍平阜（錢譯：喀輪阿巴兔不喇）即清廷所設邊防最北端，行入外蒙喀爾喀境內，不僅沙深非內地之比，境內絕不見穹廬駐軍，獷悍狡獪的喀爾喀國人，令使團一行人不得不繃緊神經，小心行走。在外蒙行走一週後，傳言「北方諸國之俗，勝負但決一戰，戰既敗衄，則上下皆鳥獸散」<sup>109</sup> 之景，竟讓使團近距離的意外碰上。

## （二）中止前進：蒙古部落戰事掠影

六月初，忽見途中「喀爾喀國人男、婦追隨駝馬，雜沓絡繹而南，不下數萬，奔忙惶惚……」<sup>110</sup> 的大規模逃難景象，錢良擇震懾此景，為此賦詩一組，其詩曰：

殊俗真同鳥獸群，紛紛臨難盡忘君。可汗一敗人爭遁，國事軍情概不聞。

掣馬驅駝半婦人，白羊黃犢亦隨身。不愁終日移家去，翻愛他鄉草色新。

<sup>106</sup> 關於歸化城關帝信仰的出現，前已討論，請見註 75、76。另值得一提的是，當時不僅歸化城可見關帝廟，新疆伊犁滿族官兵駐扎的惠寧城亦建有關帝廟，而在伊犁漢族軍民集中駐扎的綏定城，更建有兩座關帝廟。研究參見齊清順，〈清代新疆的關羽崇拜〉，《清史研究》第 3 期（1998 年 8 月），頁 101-106。

<sup>107</sup> 見「五月二十六日」條。〔清〕張鵬翻，《奉使俄羅斯日記》，頁 17。

<sup>108</sup> 見「六月六日」條。〔清〕錢良擇，《出塞紀略》，頁 4106。

<sup>109</sup> 見「六月九日」條。同前註，頁 4109。

<sup>110</sup> 同前註。

置兒鞍背等懷中，絮裏函盛絡繹從。遇便開襟來乳哺，全家相對在駝峰。<sup>111</sup>

精準勾勒塞外民族逐水草而居的生活習性亦反映在面對民族戰事的心態上，部落戰敗，上至部酋下至族人，無不爭遁，何以戰敗？如何抗敵的民族自尊心似乎不比當下求溫飽重要。交融理性、感性筆觸，使倉皇的逃難圖像瞬間成為一幕「一目了然」理解其民族性的生動畫面。有意思的是，張、錢二人面對這幕突如其來的畫面，流露出不同的觀看心情。

在《出塞紀略》裡，錢良擇的敘述重點與使團人心惶惶之情相扣。當使團往北行走，見倉皇奔逃向南的喀爾喀人，聽聞其國戰敗，繪聲繪影的戰事氛圍感染了當時處於「狀況外」的大清使團，見所記：

詢之，乃知其主徒失也。兔汗提兵五十萬與阿魯特（又譯厄魯特）國主戰於邊界，一戰大敗，全軍崩潰，國主逃遁不知所之。……其所居地，名土刺必喇去色楞格不，數程為我軍取道必由之路，亦為阿魯特所燼，勢不可復往，變生意外，人懷疑懼傳言洶洶，莫得其情。初十日，……車臣汗使至，以敗北聞於我軍，始知實信，乃阿魯特國主戰勝之後，即以奇兵突入徒失也。……夜，理藩院齎奏使者亦至，索師因具疏備述始末，馳驛上聞。是日傳聞阿魯特兵至，三軍狼狽而逃，雖嚴禁不能止遏合營，竟日不得食，主帥尤窘，躬擐甲冑，以備不虞，夜命營中控馬，披執立以待。……人人內危之甚，終莫敢就枕也。<sup>112</sup>

從聽聞到證實傳聞，刻畫使團掌握情資，惶恐戒備的「保命」反應。

<sup>111</sup> 引詩見「六月十三日」條。同前註，頁 4124。

<sup>112</sup> 見「六月九日」、「六月十日」條。同前註，頁 4109-4112。

敘述口吻凸出常人一旦遇到危機下意識產生的自保動作，其間穿插車臣汗和理藩院使者呈報戰事的身影，某一程度上突顯使團置身戰區却又置身事外的立場。因事出突然，特記一筆「復誌其真境如此，以貽同志知之。」<sup>113</sup> 以見證之姿，詳整介紹戰勝／敗雙方的歷史背景和地理位置，<sup>114</sup> 之後賦詩四首：

強國何因忽召災，草枯泉竭馬虺隤。闕氏梳掠方臨鏡，捲地弓刀冒頓來。

同在元黃覆載中，天心何事遣爭雄。地無城郭民無信，一戰俄看萬帳空。

名王辭俗點禪燈，未必吞針有異能。道力不勝兵燹急，遁逃猶契豔摩登。

左衽兒郎二十餘，錦衣狐帽耳垂珠。倉皇數騎殘星去，此亦王孫泣路隅。<sup>115</sup>

從喀爾喀的處境起筆，既描繪塞外民族爭雄起戰事，造成民墜塗炭景象，也勾勒兵荒馬亂中宗教領袖如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的狼狽身影，<sup>116</sup> 繼而流露對逃難的喀爾喀人抱以同情的理解。相較錢良擇的感性態度，張鵬翮則有意以「大清使節」立場，謹慎看待這場朝貢國的部落戰爭。摘錄其記：

夫額諾德（即厄魯特）、喀爾喀各稱汗塞外，而貢獻天朝，其

<sup>113</sup> 見「六月十日」條。同前註，頁 4112。

<sup>114</sup> 見「六月十日」之附錄。同前註，頁 4112-4121。

<sup>115</sup> 見「六月十一日」條。同前註，頁 4121-4122。

<sup>116</sup> 這位宗教領袖為哲布尊丹巴一世（1635-1723），其出身於喀爾喀土謝圖汗部，為外蒙的黃教領袖。喀爾喀的內附，初由噶爾丹的逼迫，繼之以哲布尊丹巴一世的倡導，終因聖祖的納降安插，得以順利完成。關於哲布尊丹巴一世帶領喀爾喀內附的始末，可參閱黃金河，《哲布尊丹巴與外蒙古》（臺北：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會，1968 年）。

彼此仇殺與中國無與也。天王好道之德，憫其國土荼毒，遣尚書同達賴喇嘛令其講好，息兵各疆安土，真天地之心也。<sup>117</sup> 詎額諾德與喀爾喀，陽為和議之計，而陰行襲取之師，據其妻孥，覆其巢穴，國人望風奔逃，直投中國，則將收之乎？抑棄之乎？此大費廟堂之籌畫也。兩國同為貢獻之人，天朝原無異視，今喀爾喀戰敗，聲言天朝大師來援，以延須臾之命，繼之旌旗飛揚，三軍至止，正中額諾德之疑，況阿爾尼（即阿喇尼）未至其國，不先諭以出使俄羅斯之意，當兩國勝負之餘，忽而王師從天而降，彼必疑其襲己也。始告以出使俄羅斯也，非為爾兩國也。彼能遽信乎？使俄羅斯之意，原為喀爾喀國土相鄰，今其國既覆，人民逃竄，我師囤糧何所，夫天下之當慎者，不可啟釁端也。先幾之哲，可不早辨乎！<sup>118</sup>

論述重點有二：其一，遇上潰逃的喀爾喀國人，居於共主地位的清廷「將收之乎？抑棄之乎？」；其二，針對喀爾喀聲稱救援一事，語重心長的提出「天下之當慎者，不可啟釁端也。」為何張鵬翮認為清廷收留喀爾喀難民須費思量，不可冒然？為何面對厄魯特與喀爾喀的糾葛，須謹慎處理，避免挑釁任何一方？

從兩人日誌得知，這場戰事主角是平時互爭土地資源的厄魯特、喀爾喀，交戰起因是喀爾喀國人殺害厄魯特國主之弟，新仇舊恨引燃戰火。然須留意的是，兩人敘述第一線戰事多是傳聞交織而成，非親

<sup>117</sup> 文中提到「天王好道之德」是指康熙二十七年正月，喀爾喀土謝圖汗發兵殺死札薩克圖汗，以及前往札薩克圖汗部進行聯繫的噶爾丹之弟多爾濟扎布（生卒年不詳）。清廷聞知，擔心會成為噶爾丹大規模入侵喀爾喀的藉口，乃要求土謝圖汗罷兵。而此時桑結嘉措（1653-1705）假藉「達賴喇嘛」名義派來的使臣至噶爾丹營地，帶來最新「諭旨」，讓准噶爾方面亦暫時退兵，準備會盟。相關史事參閱鷹揚，《在大漠那邊：近世的蒙古與戰爭》，頁30-31。

<sup>118</sup> 見「六月十日」條。〔清〕張鵬翮，《奉使俄羅斯日記》，頁21。

征火線的真實戰況，唯須參看其他資料，才能更精準掌握這場戰事。究其實這是一場漠西蒙古準噶爾部與漠北蒙古土謝圖汗部的戰役。當時噶爾丹欲一統蒙古，趁喀爾喀內部矛盾，以及其土謝圖汗部軍隊主力在鄂爾渾河一帶準備與俄國交戰之際，欲報弟仇，乘機自杭愛山後掠取喀爾喀右翼，引兵進攻土謝圖汗部。面對噶爾丹突襲，頓時喀爾喀軍隊腹背受敵，被迫停止驅逐俄國入侵者，倉促撤退，集中應對噶爾丹入侵，然事出突然，終一戰即潰，殘餘部民紛逃入內蒙，尋求清廷保護。<sup>119</sup>

客觀思考這場戰事，從朝貢利益關係看，清廷不派兵支援，頗有「鷸蚌相爭，漁翁獲利」之味。然而，從邊防意義思之，喀爾喀在大清邊界滯留，給清朝帶來的直接問題是邊防能否安定的問題。清廷不能毫無仁義將之拒於門外，但喀爾喀與厄魯特的衝突已誓不兩立，一旦收容喀爾喀等同與聲勢日漲的噶爾丹對立，而噶爾丹是個不容小覷的威脅勢力，清廷不得不小心與之周旋。可是，若不收容喀爾喀難民，不留心喀爾喀局勢，一旦與俄結盟，亦勢不利於清。<sup>120</sup> 不論是喀爾喀與厄魯特，對大清而言，誠如聖祖言「民心悅」乃「眾志成城」，<sup>121</sup> 可謂比長城更佳之屏藩。因此，面對這場戰事，清廷無法全然袖手旁

<sup>119</sup> 參閱項勇，〈略論准噶之戰與喀爾喀附清〉，《新疆大學歷史學報》第36卷第2期（2008年3月），頁57-60；香蓮，〈簡述漠北喀爾喀歸附清朝的過程〉，《蒙古文史學院赤峰學院學報》第3卷第12期（2011年12月），頁13-14。

<sup>120</sup> 自明末起俄國勢力已漸侵犯喀爾喀國領地。有關喀爾喀與俄國、中國的互動研究，可參閱〔俄〕沙斯季娜（H. P. Shastina）著，北京師範大學外語系譯，《十七世紀俄蒙通使關係》（北京：商務印書館，1977年）；〔俄〕沃爾那德斯基（George Vernadsky）著，札奇斯欽譯，《蒙古與俄羅斯》（臺北：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1955年）；齊木德道爾吉，〈1640年以後的清朝與喀爾喀的關係〉，《內蒙古大學學報》第4期（1998年7月），頁12-20；達立布，〈清太宗和清世祖對漠北喀爾喀部的招撫〉，《歷史研究》第2期（2011年4月），頁50-62；〔日〕柳澤明著，額爾敦巴特爾譯，〈1688年噶爾丹入侵後的喀爾喀諸台吉與俄國〉，《蒙古學信息》第1期（1995年3月），頁1-8。

<sup>121</sup> 〔清〕覺羅勒德洪等奉修，《大清聖祖仁皇帝實錄》，第4輯，卷151，頁2045。

觀。<sup>122</sup> 顯然中、俄、蒙複雜的邊境情勢，稍不注意，大清版圖將隨之更易。循此，張鵬翮已然嗅出這場戰事背後錯綜複雜的角力爭逐。

奉命使俄的大清使團，因這場塞外戰事中止前進。這趟身心煎熬卻無功而返之旅，途中歷經地形氣候的考驗、缺水問題、遭蒙古人夜襲、迷路等一連串挫折，加以返程「糧竭莫繼，一日止一餐」、「所謂一餐者，不過將散麵少許用水調熟，如糊窗之漿，人吃一碗，以度命耳」<sup>123</sup> 以致使團中「馬瘦行步不進，茲見人之胖者漸瘦，而瘦者已枯」，<sup>124</sup> 病歿者不少，慘狀如錢良擇所繪：

無木為棺又無柴焚化，計無所出，乃以馬糞煨令半枯，拆碎其骨裹回，其慘至此。若尋常死者，則直委之溝壑而已。全軍人數死者九百餘，駝死者千餘，馬死者二萬七千餘，統計費銀二百五十餘萬。<sup>125</sup>

彷彿鬼門關走一回，錢氏不禁發出「旨到稍遲數日，恐俱為絕域之鬼」<sup>126</sup> 之嘆，返鄉如同重生，也使張鵬翮心情從去程聽聞〈四時曲〉「離人思故鄉，對此轉淒涼」<sup>127</sup> 之幽幽遊子情，轉成歸途急速寄家書報平安的實際行動。

<sup>122</sup> 翻閱張、錢日誌，以及相關研究，得知康熙二十七年六月，聖祖接到理藩院尚書阿喇尼奏報後，為防止噶爾丹尾隨南逃的喀爾喀人入內蒙，立刻派兵暫時駐防內蒙一帶，直至十月才正式下令救濟、安置南逃的喀爾喀國人。易言之，是年噶爾丹入侵漠北，既促成喀爾喀投靠大清，同時促使康熙決心處理噶爾丹勢力的轉折點。有關康熙援助喀爾喀，可參閱李秀梅，〈康熙對噶爾丹的「和」〉，《清朝統一準噶爾史實研究：以高層決策為中心》，第1章，頁1-40；黑龍，〈1688-1690年康熙救助南下蒙古喀爾喀之新史料〉，《中國邊疆史地研究》第21卷第2期（2011年6月），頁130-140。而清廷與準噶爾的關係研究，可參閱註5。

<sup>123</sup> 見〔清〕錢良擇，《出塞紀略》，頁4130。

<sup>124</sup> 見「七月二十四日」條。〔清〕張鵬翮，《奉使俄羅斯日記》，頁30。

<sup>125</sup> 見〔清〕錢良擇，《出塞紀略》，頁4131。

<sup>126</sup> 同前註，頁4129。

<sup>127</sup> 見「五月二十五日」條。〔清〕張鵬翮，《奉使俄羅斯日記》，頁17。

#### 四、清初的邊塞書寫：張、錢出使紀行之深層解讀

透過之前討論，張鵬翮《奉使俄羅斯日記》、錢良擇《出塞紀略》中所見「實景實寫」之內容，不單是個人的行旅日誌，亦可當作一種文化考察筆記，具觀測清初邊疆歷史、文化的多重意義。值得進一步深論的是，奉使出塞，意味步出關外。關外，按傳統說法，泛指長城之外的地區。而行走關外之地，一般有一定的路線依循，此路是隨歷朝更替而漸次形成——沿途驛館可視為一條歷史軌跡。這軌跡，在實際情況提供將士文官行旅之所需，同時也可視為召喚歷史記憶和回應歷朝邊塞詩人的媒介。具體的說，驛館、驛站沿途之所見廢墟、遺址等，都易使歷朝的將士文官遁入時空隧道，產生一種「實景虛寫」的創作心思——運用典故、借用前朝詩人或作品，引起一種超越時空的情感共鳴。這種思維的跳躍與落差，是歷朝邊塞詩的特色之一。<sup>128</sup> 張鵬翮、錢良擇的日誌同樣可見此股情緒之流露。

翻讀兩人日誌，萌生邊塞想像之思，較集中在重要的關隘、驛站和邊鎮，且出塞後隨著旅況、身心狀況愈趨不佳，此思緒又多萌發於未至外蒙之前。出發不久，乘著士氣勃勃之勢，行至「天下第一雄關」居庸關，<sup>129</sup> 千年古關形勢雄偉，錢良擇作〈題居庸關〉讚嘆奇景，表露「我乘使者車，憑軾壯胸臆，忘其驅騁艱，叱馭過偃仄，作詩紀天險，兼以歌帝德」<sup>130</sup> 之豪氣口吻，頗有盛唐邊塞詩表徵國富兵強

<sup>128</sup> 據王文進的研究，唐人邊塞大量使用漢代典故的現象，這現象其實是成立於南朝，南朝邊塞詩大量運用漢代邊塞戰爭之典故，確立了邊塞詩的基本色調。見王文進著，《南朝邊塞詩新論》（台北：里仁書局，2000年）。另外，有關驛站詩研究目前較詳者為李德輝，《唐宋時期驛館制度及其與文學之關係研究》（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8年）。

<sup>129</sup> 居庸關位於北京西北四十六公里處的高山峽谷之中，是萬里長城上歷史最悠久的關隘，又稱天下第一關、中原第一關。關於其歷史沿革，可參閱李德仲，《居庸關的記憶》（北京：北京美術攝影出版社，2005年）。

<sup>130</sup> 見「五月三日」條。〔清〕錢良擇，《出塞紀略》，頁4044。

般的自信。面對險關，張鵬翮感受更為細膩，不僅情緒溢出實景之外，居庸關旋成為其召喚特定歷史場所的媒介——此地曾是明成祖駐軍處。見所記：

明永樂北征過此，顧謂侍臣曰：「雪後看山，此景最佳，雖有善畫者，莫能圖其鬚鬚。」<sup>131</sup>

永樂八年（1410）二月，成祖親征北虜，引文隨臣指金幼孜。<sup>132</sup> 若說錢良擇是挾「使」之名，抒懷頌揚我朝之情，那麼張氏則通過居庸關，進入歷史想像層次，藉成祖與賢臣對話，自比當年的金幼孜。其召喚特定歷史人物之目的，乃內心慾望之投射——寄寓效忠，彰顯康熙英明睿智，並交揉征服他者（邊域／前朝）之想望。過居庸關，張鵬翮同金幼孜，經榆林驛到懷來衛，過土木堡，張氏再次進入歷史迴廊——此乃明英宗（1427-1464）兵敗蒙古處，史稱「土木堡之變」。<sup>133</sup> 當大清使團平順通過，張氏特此一記「今我軍誤駐此地，得獲平

<sup>131</sup> 見「五月三日」條。〔清〕張鵬翮，《奉使俄羅斯日記》，頁4。

<sup>132</sup> 這段明成祖與金幼孜的對話，出自金幼孜《北征錄》「永樂八年（1410）二月十三日」條。〔明〕金幼孜，《北征錄》收入胡思敬輯，《豫章叢書》（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頁465。明初，殘元勢力及其後世子孫，仍然盤踞著原來元帝國的北方領土嶺北行省、中書省和遼陽行省的一部分，時時威脅著明王朝的統治，因此自洪武朝起，明王朝的歷代統治者都十分重視對蒙古勢力的征討和防禦。以明成祖而言，為防止蒙古入侵干擾，自永樂八年起，五次親征漠北。相關研究或可參閱朱鴻，《明成祖與永樂政治》（臺北：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1988年）；林堃輝，《征戰與納降：論明洪武時期的蒙古政策》（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博士論文，2002年）。

<sup>133</sup> 明正統十四年（1450）八月，英宗於軍事重鎮宣府以東的懷來縣土木堡，率十萬大軍在此扎營，豈料遭驍勇有謀略的蒙古瓦喇部落首領識破戰略，慘遭擄走。學者一般公認此事件是明朝治理蒙古邊防由強轉衰的轉折點。自此，明朝對北方游牧民族從洪武朝的「進攻」轉為「守勢」，用重兵守住九鎮。附帶一提，明成祖有隨臣金幼孜寫下《北征錄》描述親征經過；明英宗遭擄亦有侍臣袁彬（1401-1488）撰述《北征事蹟》，詳述英宗在蒙古期間的生活情況及當時明蒙之間的各種往來活動，是書為研究土木堡之變後，明朝與蒙古關係及蒙古內部情況的第一手資料。〔明〕袁彬，《北征事蹟》，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臺南：

安，良由天眷中朝，使臣得以蒙休矣。」<sup>134</sup> 其「不刻意」評述而「有意」提及前朝「英宗遭擄」的重大邊防事件，實意有所指的宣示我大清不僅征服明朝，處理邊疆情勢更比前朝平穩。

張鵬翮視金幼孜為典範人物，除了將個人企望投射其上，幼孜《北征錄》中所記聞，也成為張的旅程導覽。使團過保安抵雞鳴驛，鵬翮亦步亦趨追隨金幼孜的視野。其引《北征錄》：「雞鳴山起於唐太宗征高麗，至此登山雞鳴，由是得名。」<sup>135</sup> 此句彷彿指稱此驛的歷史符碼，幼孜、鵬翮猶如傳承的使者，雞鳴驛累代一層層的歷史、傳聞通過他們的傳載，從實用意義的驛站而蘊涵人文的歷史意義。見《奉使俄羅斯日記》載述：

雞鳴驛石城完整，渾河遠其前，背擁雞鳴山。峯巒聳峻，紺宇凌霄，蜿蜒十餘里；陵阜妍秀，楊柳依依，地志名曰「上花園」，遼蕭后種花處。河中石柱林立，相傳魯班作橋於此，期以雞未鳴而成。其姊修靜此山，勿使弟勞，預為雞鳴，遂輟工。昔金幼孜聞此說，以無可考據疑之。不知天地之人，何所不有。《三齊略記》曰：「始皇於海中作石橋，海神為之豎柱，始皇求與神見。神曰：『我形醜，莫圖我形，常與帝相見。』」乃入海四十里，見海神，工人潛以腳畫其狀，神怒曰：『帝負約，速去！』始皇轉馬還，前腳猶立，後腳隨崩，僅得登岸。」此似魯班作

---

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6年影印首都圖書館藏明嘉靖吳郡袁氏嘉趣堂刻金聲玉振集本），史部，冊46，頁152-158。又，明廷派人與蒙古議和贖回英宗的經過，則由當時使臣李實（生卒不詳），字孟誠，四川合州人，正統七年（1442）進士，奉使和議遂成，英宗被釋還京，奉使經過詳閱其著《虛麓李公奉使錄》。〔明〕李實，《虛麓李公奉使錄》，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6年影印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刻本），史部，冊46，頁104-133。

<sup>134</sup> 見「五月四日」條。〔清〕張鵬翮，《奉使俄羅斯日記》，頁5。

<sup>135</sup> 見「五月五日」條。同前註，頁6。

橋之說也。<sup>136</sup>

鵬翻的記述大都建立在《北征錄》上，從而進行想像填補。<sup>137</sup> 筆下的雞鳴驛，不單有政治的歷史意義，還多了「上花園」的浪漫傳聞和「秦始皇作石橋」如神話傳說般的有趣故事。兼融政治、歷史、文化記憶的重要驛口，置身於此易使人完成當下自我同時，也認同、再現並豐富此地的空間意義。張鵬翻於此賦詩一首，詩云：

聞說當年帝子過，清秋匹馬渡渾河。天連大漠黃雲合，地接平沙白草多。

諫獵空留丞相草，從龍漫羨侍臣珂。於今大化風行遠，萬里鳴騶奏凱歌。<sup>138</sup>

是詩既有歷史風雲的震蕩，亦有使臣承載忠誠的豪氣。從頸聯能再次窺見鵬翻自比隨明成祖五次北征的金幼孜，如此一再強調、宣示不辱使命之心，實有自我期許、自我投射之用意。

宣府，明朝北部九大邊鎮之一。<sup>139</sup>《出塞紀略》記：「宣府城周

<sup>136</sup> 同前註。

<sup>137</sup> 「十七日發雞鳴山。……其下即渾河，流出盧溝橋。有石柱數十，比列於河側，其半出地上。俗傳以為魯般造橋，未成而廢，但無紀載可考。行里餘，路甚窄，僅可容兩馬。……又行三四里，度橋。山下有土垣，乃元時花園，有舊柳數株尚存。」見〔明〕金幼孜，《北征錄》，頁465-466。

<sup>138</sup> 見張鵬翻，〈雞鳴山懷古〉，《遂寧張文端公全集》，卷5，頁383。

<sup>139</sup> 明朝建立後，為防止北元勢力反撲，明太祖在北方邊境分封諸子並設重兵守邊，其後逐漸轉為總兵官鎮守。為防禦帝國北境，東至遼東，西至甘肅，共設九個軍事重鎮，史稱「九邊」。九邊至東而西依次為：遼東鎮、薊州鎮、宣府鎮、大同鎮、山西鎮、綏遠鎮、甘肅鎮、寧夏鎮、固原鎮。關於明代九邊的設置沿革，相關文獻資料可參閱〔明〕魏煥，《皇明九邊考》，收入《中國西北文獻叢書》（蘭州：蘭州古籍書店，1990年），第4輯；〔明〕霍冀、孫應元編，《九邊圖說》，收入《中國邊疆史地叢書》（臺北：台聯國風出版社，1969年），初編，冊5；〔明〕鄭曉，《邊紀略》，收入《中國西北文獻叢書》，第3輯；〔明〕張雨，《邊政考》，收入《中國西北文獻叢書》，第3輯。而相關研究或可參考：〔日〕田村實造，〈明

圍數十里，萬瓦鱗次，樓坊櫛比，可敵江淮間名郡，誠邊城一雄鎮。」<sup>140</sup> 知清代仍承明制，此地榮景似未受易代影響。使團行經宣府，張、錢兩人不約而同「略去」邊鎮文化的介述，而較側重歷史沿革和邊防概況的描述。據錢氏云：

宣府左右二衛以是為西北腰脇要害之所，（明）駐兵三十萬，鎮遏之歲輸金穀餉，所費不可勝計。本朝內外一家，邊庭無事，駐防甲士不過數千而已。<sup>141</sup>

指出位置重要性同時，刻意與前朝相較，實有較論兩朝治理邊疆成效之意味。<sup>142</sup> 相較錢氏，張鵬翮則含蓄透過歷朝邊塞典故的象徵手法，投射身為大清使臣的威風，藉以展露「再現」帝國盛世的企望。見其豪氣題云：

自宣府迤東至遼鎮，一千餘里，即遼東遼西二郡，地皆號沿邊扼要，歷代防守，糜費金錢，而人法不能兼善。我朝威治廣被，如天下無不覆，如地之無不載，如日月之無不照臨。凡大荒絕域，載髮舍齒之倫，莫不來享來王，幅員之廣，亙古未有。九

---

代之北邊防衛體制》，《明代滿蒙史研究》（京都：京都大學文學部，1963年），頁73-161；〔日〕和田清，〈明代の北邊防備〉，《東亞史研究・蒙古篇》（東京：東洋文庫，1959年），頁813-833；向燕南，〈明代邊防史地撰述的勃興〉，《北京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1期（2000年），頁137-143；趙現海，〈明代九邊軍鎮體制研究〉（長春：東北師範大學中國古代史博士論文，2005年）；賴建誠，〈邊鎮糧餉：明代中後期的邊防經費與國家財政危機（1531-1602）〉（臺北：中央研究院出版委員會，2008年）。

<sup>140</sup> 見「五月六日」條。〔清〕錢良擇，《出塞紀略》，頁4046。

<sup>141</sup> 同前註，頁4047。

<sup>142</sup> 宣府，位於北京西北方，是蒙古部族進攻北京的捷徑。明嘉靖時期（1521-1566）蒙古部族屢次進犯，宣府不僅為拱衛京師的北防核心，更是明朝最重視的北邊重鎮。相關研究可參考吳彥儒，《明嘉靖朝宣府鎮的軍事措施之研究》（嘉義：嘉義大學史地學系碩士論文，2010年）；〔日〕松本隆晴，〈明代成化初年の宣府鎮〉，《栃木史學》第18期（2004年3月），頁44-55。

塞悉屬內地，班固云：「邊城晏閒，牛馬布野，數世無犬吠之驚，黎部無干戈之役。」<sup>143</sup>

班固所言為昭君出塞後，促成漢匈兩族和睦相處，海宇昇平，邊疆無事之景象，張氏特別借引《漢書》歌詠昭君和親的段落，於此寄寓心中理想的邊塞圖像。而除了駐防要塞的邊鎮，錢良擇〈長城行〉一詩，在抒懷萬里長城的防禦意義同時，亦刻意從歷史想像拉回現實，把觸目所見視為大清帝國疆界的實際展示，題云「吾皇神武馭以德，窮髮遠近均恩膏。大開關城置郵遞，骨都頡利爭來朝」<sup>144</sup> 可見作為防禦、區隔國界的長城，征人至此都不免詠懷心志一番。

顯然，從居庸關至宣府的一段路程，不單視為遠離政治中心的帝國邊境，實際上作為防禦邊疆少數民族入侵的邊鎮驛口，在歷史風沙的吹襲下，堆疊代代的邊塞典事／地方記憶和文化情感，亦是一處處召喚、回應歷朝邊塞詩人、文臣武將的重要通道。身為傳統知識份子的張鵬翻、錢良擇，可想而知比同行的滿臣、外國傳教士更能「感同身受」的想像、傳承於此的累代「共同情感」，因而二人的邊塞書寫，在一定程度上可視為傳統邊塞作品的餘影、再現。

然須進一步突顯的是，一代有一代的國勢，歷代邊塞書寫在「同」中仍會各展其「獨特」之面向。首先，如同傳統邊塞詩人——南朝邊塞詩借用漢代邊塞戰爭的典故；唐人邊塞詩可見漢代、南朝邊塞詩之影，<sup>145</sup> 類似通過歷朝典事想像邊塞，在張鵬翻、錢良擇的邊塞書寫亦可瞥見，比方：或借用班固、鮑照等的詩文；<sup>146</sup> 然而，這部分比

<sup>143</sup> 見「五月初六日」條。〔清〕張鵬翻，《奉使俄羅斯日記》，頁7。

<sup>144</sup> 見「五月七日」條。〔清〕錢良擇，《出塞紀略》，頁4051。

<sup>145</sup> 這方面研究或可參看王文進，《南朝邊塞詩新論》（臺北：里仁書局，2000年）；任文京，《唐代邊塞詩的文化闡釋》（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

<sup>146</sup> 例如：張氏於「五月初六日」條，曾借用班固《漢書》所載王昭君和親事，而錢氏於「五月十六日」條題詩〈過空城故墟〉詩中提及南朝鮑照。分別見〔清〕張鵬翻，《奉使俄羅斯

例不高，較多的是拿前朝（明代）所發生的邊塞事件或出塞人物，進行借擬、參照。由於時代相近，因此兩人的出塞書寫在某一程度上提供窺測明、清邊塞事的線索，具有一定的參考意義。其次，也是較值得突顯的是，張鵬翮屢次提到明成祖及其隨臣金幼孜，有意拿清聖祖對比永樂帝，借金幼孜自比。這一參照固有其「寄寓效忠、彰顯康熙英明」的用意，但事實上鵬翮（或錢良擇）一再稱頌吾皇聖德同時，隱然透露一絲與前朝有別的意圖：明成祖是以「武力」出征漠北，康熙則欲以「懷柔」馴服；金幼孜以「征戰」出塞，鵬翮則以「奉使」出塞。兩相對照，於某一程度上可視為清初漢臣在認同「聖祖邊疆國策」的前提下，展現清初出塞書寫的特色。

誠然，帝國邊界上的關隘、邊鎮和驛口，易使人心生邊塞想像之思，從而興起回應歷朝邊塞典事的舉動。這種跨時空的遙相應和，似已成歷來出塞的文官將士必參與的一個儀式。張鵬翮、錢良擇的出塞書寫正是有這層想像的心理活動，致使《奉使俄羅斯日記》、《出塞紀略》多了一分人文、文學的感性視野。值得一述的是，這份感性視野在使團離邊鎮愈來愈遠，之後入塞外大城歸化城南的青冢時再次流露。循此得知，青冢背後的昭君（約 52-20 B.C）事蹟、傳說，<sup>147</sup> 為中原文官將士行走塞外寄託心志，或者標示中原與邊疆民族友好的一個文化符碼。

據《出塞紀略》描繪清初歸化城南的昭君墓：

昭君冢在城南，高阜巋然望之可見，遂策馬往觀。道經一河廣二三丈，水可及髀，古之黑河也。……行三十里至冢前，冢高三十餘丈，廣徑數畝，其南琉璃碎瓦堆積滿地，意舊有祠宇宮

---

日記》，頁 7；〔清〕錢良擇，《出塞紀略》，頁 4065。

<sup>147</sup> 關於昭君的歷史傳說，或可參看鄒志斌、蔡長明主編，《昭君文化叢書》（成都：四川美術出版社，2010 年）。叢書系列含：散文卷、小說卷、圖冊卷、民間故事卷、論文卷、傳說卷。

殿，惜無碑碣可考，止存二石虎、石馬色黑，一石獅色純白，又有石幢一，刻蒙古書豎旛於上。舊傳塞草皆黃，惟昭君冢獨青，故名青冢。今身履其地，目擊凡草皆青，一望別無，傳聞不可盡信。大抵若此，然或草衰時有異，亦未可定也。冢巔有土人壘土作小方亭，藏畫佛及零碎紬布、豆麥於中，以土坯堵其四面。冢旁有大柳樹一株，塞外所未經見。<sup>148</sup>

當使團暫駐歸化城，良擇彷彿好奇的旅人「特別前往」觀看青冢，並在「親臨實景」中打破原先對「昭君冢獨青」的傳聞想像。這段「實景實寫」的文字記錄，如同一張寫真，得以窺測清初明妃墓的整體概況。即使「實景」不如心中想像，但昭君墓作為當年出塞和親，換得胡漢和平的一種表徵，依舊有股深深的感召力，讓出塞遊子不自覺為其賦詩。見錢良擇〈題昭君墓〉：

雲陽苦霧當晝黑，長信秋風晚悽惻。漢皇真不及單于，營繕佳城埋國色。

崇邱深壙巍然存，有情豐草圍青痕。珠襦周匝玉匣固，至今香骨猶當溫。

中華佳麗葬花盡，一坏萬古留乾坤。沙場金屋何厚薄，月明彼此愁黃昏。

胭脂山崩黑河竭，穹廬終不祧芳魂。我來弔古徘徊久，手挾蓬蒿奠卮酒。

此是紅顏最幸人，椒房永巷無其偶。并勝中宮老白頭，黃貂新室稱文母。<sup>149</sup>

張鵬翻亦作〈昭君青冢〉詩一首：

<sup>148</sup> 見「五月十八日」條。〔清〕錢良擇，《出塞紀略》，頁4074-4075。

<sup>149</sup> 同前註，頁4077。

獨留青冢古城隅，愧殺當年漢大夫。萬里長城憑粉黛，千秋國士老樵漁。  
溪邊流影魂飛動，塞上吹簫鳳有無。延壽寫真君莫恨，長門空鎖月明孤。<sup>150</sup>

若說前引文是一張實景寫真，那麼詩則是促使其成為一張有歷史、文化涵義的照片。細讀二詩，錢氏抒昭君際遇，以胡漢終和，嘉其志節；鵬翮則是借畫工誤身，憐其哀怨。兩人雖著眼有別，可憑弔之情都關涉著一段不可抹滅的歷史事蹟。據范曄（398-445）簡要追敘西漢元帝（76-33 B.C）時王昭君之出塞過程：

昭君字嬙，南郡人也。初，元帝時，以良家子選入掖庭。時呼韓邪來朝，帝敕以宮女五人賜之。昭君入宮數歲，不得見御，積悲怨，乃請掖庭令求行。呼韓邪臨辭大會，帝召五女以示之。昭君豐容靚飾，光明漢宮，顧景裴回，竦動左右。帝見大驚，意欲留之，而難於失信，遂與匈奴。生二子。及呼韓邪死，其前閼氏子代立，欲妻之，昭君上書求歸，成帝敕令從胡俗，遂復為後單于閼氏焉。<sup>151</sup>

這段記載是正史中唯一瞭解昭君事蹟的依據。正史裡昭君離家、進宮、出塞、再嫁，其人生波折從故鄉、漢宮到塞外，綿延千里，史家形塑悲怨、忠貞、顧大局的形象氣質。正是其波折經歷和堅貞品格，促使昭君出塞一再成為歷來邊塞詩中表現「和平友好」、「離人閨怨」的重要典故之一。循此，回頭品味張、錢之詩，以弔古之心傷懷昭君出塞，鮮明地呼應歷來詠昭君的悲怨傳統；雖然，兩人未滲入個人的

<sup>150</sup> 見〔清〕張鵬翮，〈詩〉，《遂寧張文端公全集》，卷5，頁383。

<sup>151</sup> 見〔劉宋〕范曄，〈南匈奴列傳〉，《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冊10，卷89，頁2941。

品評，也未明顯寄託心志於其中，但單從二人不約而同的前去朝聖，各賦詩一首，顯見青冢已然是行走塞外一處重要的文化景觀。

簡言之，張鵬翮、錢良擇在《奉使俄羅斯日記》、《出塞紀略》的出塞書寫，既交錯著「實景實寫」如同文化考察的筆記，也融入傳統邊塞詩中「實景虛寫」的文化想像，從中展現清初邊塞書寫之特色。<sup>152</sup>

## 五、結語：張、錢出使紀行之書寫意義

以索額圖為首的大清使團，雖未能完成使命，但透過隨行漢臣張鵬翮、錢良擇的日誌，得以一窺這趟旅程點滴。《奉使俄羅斯日記》、《出塞紀略》雖不見俄羅斯風光，但卻具體鮮明的捕捉清初邊塞的風土民情，以及一場塞外戰事，提供觀測清初邊疆情勢的第一手資料。雖然二書也未能見到中、俄使臣的談判，但張鵬翮、錢良擇不時透過召喚歷朝人物、邊塞典事的手法，或寄託心志、或抒懷雜感，交揉文學、文化、歷史意義的旅誌，豐富這趟勞而無功的旅程。又，二書不單是個人旅誌，也真實反映大清使團出塞之艱辛，不失為一個可供參考的經驗紀實。

挾「出使」之義出塞，張鵬翮、錢良擇身份、性情有別，表露不一致的觀看視角和出塞心情。特別是鵬翮自比金幼孜，冀以不辱使命，身為「隨行」的「漢臣」，鵬翮的心態透露幾項訊息：其一，從民族角度看，隨滿臣出使，再三宣示效忠，顯示聖祖時國勢已漸昇平，

---

<sup>152</sup> 更具體的說，透過張、錢兩人的詩文可發現清代邊塞書寫傾向實事實景實物之摹寫，即使抒懷，也多扣緊現實；即使帶有傳統邊塞詩餘影，所比附的人物或事件也較集中在前朝（明代），而更值得一提的是，描寫地域空間已擴及俄羅斯、漠北、漠南等。關於清代邊塞詩風之具體討論，或可參閱黃剛，〈清代邊塞詩繁榮原因初探〉，《學術研究》第6期（1996年6月），頁77-81。

朝廷用人滿、漢兼之，漢臣並未以異族皇帝看待。其二：從邊防政策看，有意拿清聖祖對比永樂帝，事實上還透露一個重要的區隔——成祖出征目的在守住邊疆，防止入侵；康熙目的是企圖拓展疆域，轉守為攻。簡言之，兩人的出使記錄，錢氏常以抒懷之筆，把邊塞所見聞予以詩意化、形象化，補充張氏記錄的空白；張氏言簡紀實，不乏建言，像是提議將歸化地區納入教化範圍以「增版宇而廣聖化」的思想，在某一程度上可說進一步深化錢氏《出塞紀略》文字背後的文化意義，可謂互為參照，相互補充。

總之，在康熙勦平三藩、統一臺灣後，旋即把重心轉向處理邊疆問題。從派使赴俄到使團途中遇上外蒙戰事，均冀望透過「和平談判」方式解決，看似溫和的方式實藏有擴展大清疆域的雄心企圖。正是這番治國的企圖心，隨著之後的親征蒙古，或是遣臣安撫邊疆民族、或派人赴歐陸考察，也間接促成類似張鵬翮、錢良擇的遊記著作出現。比方：康熙與蒙古准噶爾戰爭期間，即有宋大業《北征日記》、殷化行《西征紀略》、范昭達《從西紀略》等行紀；再如康熙五十一年（1712）圖理琛（1667-1740）奉命撫蒙古土爾扈特部，途經西伯利亞、伊爾庫次克地，寫成《異域錄》；抑或樊守義（1682-1753）出使天主教羅馬教廷，著有《身見錄》一書。這些出使歐陸或遠征邊疆所寫的遊歷著作，兼融歷史、政治、文化、文學的多重面向，不失為研究清代文學的一個切入點，未來頗值得深入探究。

（責任校對：劉蘇靚）

## 引用書目

### 一、傳統文獻

- 〔劉宋〕范曄，〈南匈奴列傳〉，《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冊10，卷89。
- 〔明〕李實，《虛麓李公奉使錄》，《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6年影印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刻本，史部，冊46。
- 〔明〕金幼孜，《北征錄》，收入胡思敬輯，《豫章叢書》，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
- 〔明〕袁彬，《北征事蹟》，《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6年影印首都圖書館藏明嘉靖吳郡袁氏嘉趣堂刻金聲玉振本，史部，冊46。
- 〔明〕徐日升（Thomas Pereira）著，《徐日升日記》，收入黑龍江大學俄語系翻譯組、黑龍江省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所第三室合譯，《十七世紀俄中關係（1686-1691年）》，北京：商務印書館，1975年，卷2，冊4。
- 〔明〕張雨，《邊政考》，《中國西北文獻叢書》，蘭州：蘭州古籍書店，1990年，第3輯。
- 〔明〕霍冀、孫應元編，《九邊圖說》，《中國邊疆史地叢書》，臺北：台聯國風出版社，1969年，冊5。
- 〔明〕鄭曉，《邊紀略》，《中國西北文獻叢書》，蘭州：蘭州古籍書店，1990年，第3輯。
- 〔明〕魏煥，《皇明九邊考》，《中國西北文獻叢書》，蘭州：蘭州古籍書店，1990年，第4輯。
- 〔清〕佚名，《平定羅剎方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影印清光緒潘氏刻《功順堂叢書》本，史部，冊

390。

〔清〕徐珂，〈喪祭類〉，《清稗類鈔》，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冊7，卷64。

〔清〕張鵬翮，《奉使俄羅斯日記》，《中國近代內亂外禍歷史故事叢書》，臺北：廣文書局，1964年影印民國三十五年（1946）上海神州國光社版，冊11。

\_\_\_\_\_，《遂寧張文端公全集》，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清代詩文集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影印清光緒七年（1881）刻本，冊176。

〔清〕錢良擇，《出塞紀略》，收入沈雲龍選輯，《明清史料彙編初集》，臺北：文海出版社，1967年影印清道光十九年（1839）刻本，冊8。

\_\_\_\_\_，《撫雲集》，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清代詩文集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影印清雍正八年（1730）刻本，冊165。

〔清〕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98年。

〔清〕覺羅勒德洪等編，《大清聖祖仁皇帝實錄》，臺北：華聯出版社，1964年，第3輯。

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中心編，《清代理藩院資料輯錄》，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中心，1988年。

北京師範大學清史研究小組編，《一六八九年中俄尼布楚條約》，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

## 二、近人論著

王子今，《驛道史話》，北京：社會科學文出版社，2011年。

王文進，《南朝邊塞詩新論》，臺北：里仁書局，2000年。

王文輝，《內蒙古氣候》，北京：氣象出版社，1990年。

- 王守恩，〈晉商的神靈信仰〉，收入張正明、孫麗萍、白雷主編，《中國晉商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頁531-541。
- 包詩卿，〈明代軍事活動與關羽信仰傳播〉，《中州學刊》第3期，2008年5月，頁152-155。
- 朱鴻，〈明成祖與永樂政治〉，臺北：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1988年。
- 札奇斯欽，《蒙古文化與社會》，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7年。
- \_\_\_\_\_，〈蒙古之今昔〉，收入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編，《現代民國基本知識叢書》，臺北：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1955年。
- 任文京，《中國古代邊塞詩史（先秦至唐）》，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
- 向燕南，〈明代邊防史地撰述的勃興〉，《北京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1年第1期，頁137-143。
- 呂士朋，〈清代的理藩院——兼論清代對蒙藏回諸族的統治〉，《東海大學歷史學報》第1期，1997年4月，頁61-97。
- 杜曉黎，〈歸化城與蒙古草原絲路貿易〉，《內蒙古文物考古》第Z1期，1995年10月，頁42-49。
- 李美玲，〈三娘子對明末蒙漢和平友好關係的貢獻〉，《陰山學刊》第18卷第6期，2005年12月，頁79-82。
- \_\_\_\_\_，〈三娘子四嫁順義王與明末蒙漢關係〉，《陰山學刊》第16卷第6期，2003年11月，頁67-69。
- 李秀梅，《清朝統一準噶爾史實研究：以高層決策為中心》，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年。
- 李逸友，〈呼和浩特市萬部華嚴經塔的金元明各代題記〉，收入盧明輝編，《北方民族關係史論叢》，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輯，頁159-175。
- 李德輝，《唐宋時期館驛制度及其與文學之關係研究》，北京：人民文

學出版社，2008年。

- 李德仲，《居庸關的記憶》，北京：北京美術攝影出版社，2005年。
- 吳秀瓊，《清朝前期漢人在蒙古的經濟活動：清朝建立——清準戰爭結束（1636-1759）》，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碩士論文，1993年。
- 吳彥儒，《明嘉靖朝宣府鎮的軍事措施之研究》，嘉義：嘉義大學史地學系碩士論文，2010年。
- 苟波，〈道教神仙體系與明清文學〉，《道教與明清文學》，成都：巴蜀書社，2010年，頁101-115。
- 金啟掠，〈呼和浩特召廟、清真寺歷史概述〉，收入呼和浩特市蒙古語文歷史學會編印，《中國蒙古史學會論文選集》，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年，頁268-285。
- 林堃輝，《征戰與納降：論明洪武時期的蒙古政策》，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博士論文，2002年。
- 洪淑苓，《關公民間造型之研究：以關公傳說為重心的考察》，臺北：臺灣大學出版社，1995年。
- 香蓮，〈簡述漠北喀爾喀歸附清朝的過程〉，《蒙古文史學院赤峰學院學報》第3卷第12期，2011年12月，頁13-14。
- 姚北虹，〈豐州灘的盛衰經過〉，收入中共呼和浩特市委黨史資料徵集辦公室、呼和浩特市地方誌編修辦公室編，《呼和浩特史料》，呼和浩特：呼和浩特市地方誌編修辦公室，1983年，第4冊，頁161-171。
- 莊吉發，〈從薩滿信仰及秘密會黨的盛行分析清代關帝崇拜的普及〉，收入《清史論集(一)》，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7年，頁143-168。
- 珠榮嘎譯註，《阿勒坦汗傳》，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0年。
- 曹永年，〈呼和浩特市萬部華嚴經塔明代題記探討〉，《內蒙古大學學

- 報：《歷史學專集》，1981年12月，頁11-27。
- 張維華、孫西，《清前期中俄關係》，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97年。
- 張學然，《康熙帝北巡與蒙古三部落進貢考》，石家莊：河北師範大學近現代史碩士論文，2011年。
- 陳韶旭、王曉婷、李海軍，〈明朝宣府鎮邊鎮文化主流特點：兼談其對張家口人文精神形成與發展的影響〉，《河北北方學院院報：社會科學版》第26卷第6期，2010年12月，頁63-65、80。
- 葉高樹，《清朝前期的文化政策》，臺北：稻香出版社，1999年。
- 項勇，〈略論准喀之戰與喀爾喀附清〉，《新疆大學歷史學報》第36卷第2期，2008年3月，頁57-60。
- 黃治國，〈試論清代在歸化城設置駐防的經濟原因〉，《蘭州學刊》第12期，2008年12月，頁136。
- 黃金河，《哲布尊丹巴與外蒙古》，臺北：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會，1968年。
- 黃剛，〈清代邊塞詩繁榮原因初探〉，《學術研究》第6期，1996年6月，頁77-81。
- 黃麗生，《由軍事征掠到城市貿易：內蒙古歸綏地區的社會經濟變遷（14世紀中至20世紀初）》，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1995年。
- \_\_\_\_\_，〈論《阿勒坦汗傳》的撰史意識〉，臺北：蒙藏委員會，1997年。
- \_\_\_\_\_，〈邊緣與非漢：儒學及其非主流傳播〉，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0年。
- 溫浩堅，《清朝蒙古的封禁隔離政策》，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3年。
- 達力扎布，《蒙古史綱要》，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6年。

- 達立布，〈清太宗和清世祖對漠北喀爾喀部的招撫〉，《歷史研究》第 2 期，2011 年 4 月，頁 50-62。
- 歐陽增梁，《準噶爾與清朝之關係》，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碩士論文，1993 年。
- 黑龍，〈1688-1690 年康熙救助南下蒙古喀爾喀之新史料〉，《中國邊疆史地研究》第 21 卷第 2 期，2011 年 6 月，頁 130-140。
- 楊正泰，《明代驛站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年。
- 楊紹猷，《俺答汗評傳》，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 年。
- 鄒志斌、蔡長明主編，《昭君文化叢書》，成都：四川美術出版社，2010 年。
- 趙現海，《明代九邊軍鎮體制研究》，長春：東北師範大學中國古代史博士論文，2005 年。
- 趙雲田，《清代治理邊陲的樞紐——理藩院》，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 年。
- \_\_\_\_\_，〈清理藩院和中俄關係〉，《西北史地》第 3 期，1981 年 7 月，頁 108-113。
- 蔡東洲等編，《關羽崇拜研究》，成都：巴蜀書社，2001 年。
- 齊木德道爾吉，〈1640 年以後的清朝與喀爾喀的關係〉，《內蒙古大學學報》第 4 期，1998 年 7 月，12-20。
- 齊清順，〈清代新疆的關羽崇拜〉，《清史研究》第 3 期，1998 年 8 月，頁 101-106。
- 魯愚等編，《關帝文獻匯編》，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95 年。
- 劉文鵬，《清代驛傳及其與疆域形成關係之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 年。
- 劉建生、劉鵬生等，《晉商研究》，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 年。
- 劉家駒，《清朝初期的八旗圈地》，臺北：臺灣大學文學院，1964 年。
- 盧明輝、劉衍坤，《旅蒙商：17 世紀至 20 世紀中原與蒙古地區的貿

- 易關係》，北京：中國商業出版社，1995年。
- 賴建誠，《邊鎮糧餉：明代中後期的邊防經費與國家財政危機（1531-1602）》，南港：中央研究院出版委員會，2008年。
- 薛宗正，〈明人陳誠及其西使紀行詩〉，《歷代西陲邊塞詩研究》，蘭州：敦煌文藝出版社，1993年，頁195-196。
- 蘭璧，〈明朝後期的土默川〉，收入中共呼和浩特市委黨史資料徵集辦公室、呼和浩特市地方誌編修辦公室編，《呼和浩特史料》，呼和浩特：呼和浩特市地方誌編修辦公室，1983年，冊4，頁172-180。
- 薄音湖，〈呼和浩特建城年代重考〉，《內蒙古大學學報》第2期，1985年，頁35-39。
- 韓永林，《三娘子文獻考》，呼和浩特：內蒙師範大學歷史文獻學碩士論文，2009年。
- 寶玉柱，《清代蒙古族社會轉型及語言教育》，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年。
- 鷹揚，《在大漠那邊：近世的蒙古與戰爭》，臺北：知兵堂出版社，2011年。
- 〔日〕田村實造，〈明代の北邊防衛體制〉，《明代滿蒙史研究》，京都：京都大學文學部，1963年，頁73-161。
- 〔日〕松本隆晴，〈明代成化初年の宣府鎮〉，《栃木史學》第18期，2004年3月，頁44-55。
- 〔日〕和田清，〈明代の北邊防備〉，《東亞史研究・蒙古篇》，東京：東洋文庫，1959年，頁813-833。
- 〔日〕和田清著，潘世憲譯，〈土默特趙城之戰〉，《明代蒙古史論集》，北京：商務印書館，1984年，下冊，頁701-713。
- 〔日〕宮脇淳子著，曉克譯，《最後的游牧帝國：准噶爾部的興亡》，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5年。

- 〔日〕柳澤明著，額爾敦巴特爾譯，〈1688年噶爾丹入侵後的喀爾喀諸台吉與俄國〉，《蒙古學信息》第1期，1995年3月，頁1-8。
- 〔日〕森川哲雄著，葉新民譯，〈十七世紀前半葉的歸化城〉，《蒙古學資料與情報》第3、4期，1985年12月，頁12-19。
- 〔俄〕伊·亞·茲特拉金（I. YA. Zlatkin）著，馬曼麗譯，《准噶爾汗國史（1635-1758）》，北京：商務印書館，1980年。
- 〔俄〕沙斯季娜（H. P. Shastina）著，北京師範大學外語系譯，《十七世紀俄蒙通使關係》，北京：商務印書館，1977年。
- 〔俄〕沃爾那德斯基（George Vernadsky）著，札奇斯欽譯，《蒙古與俄羅斯》，臺北：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1955年。
- 〔俄〕娜·費·杰米多娃（N. F. Demidova）、弗·斯·米亞斯尼科夫（V. S. Myasnikov）著，黃玫譯，《在華俄國外交使節（1618-1658）》，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
- 〔英〕約翰·弗雷德里克·巴德利（Jhon F. Baddeley）著，吳持哲等譯，《俄國·蒙古·中國》，北京：商務印書館，1981年。
- 〔法〕加斯東·加恩（Gaston Cahen）著，江載華等譯，《彼得大帝時期的俄中關係史（1689-1730年）》，北京：商務印書館，1980年。

## **Diplomatic Journeys to the Distant Frontier: Travel Journals Written by Han Chinese Envoys during the Early Qing Period and their Literary Implications**

Yu-ching Huang\*

### **Abstract**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works recording the diplomatic missions of courtiers and generals to the imperial frontier make up a substantial proportion of travel writings from the period. These diplomatic accounts provide an important perspective for assessing the growth and decline of imperial power. For example, the mission led by Songgotu 索額圖 (1636-1703), which included a military contingent of about one thousand soldiers, is regarded as an important prelude to the signing of the “Treaty of Nerchinsk” 尼布楚條約 by China and Russia in 1689 (the 28<sup>th</sup> year of Kangxi’s 康熙 reign). Two records of Songgotu’s mission – the *Fengshi Eluosi riji* 奉使俄羅斯日記 and the *Chusai jilue* 出塞紀略 - which were written by the Administrative Officer of Military Affairs Zhang Penghe 張鵬翮 (1649-1725) and the Military Officer Qian Liangze 錢良擇 (1645-1710) respectively, represent the earliest records from the Qing dynasty of Han officials travelling beyond the frontier as envoys. The diplomatic journals

---

\* Ph.D. candidat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composed by Zhang and Qian provide important clues for understanding this first mission led by Songgotu, which in turn is essential to recovering the whole story regarding Kangxi's expedition to the Mongol tribes and the signing of the "Treaty of Nerchinsk." In addition to examining the historical information found in these diplomatic travelogues,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multiple literary and cultural meanings found within their pages.

**Key words:** envoys, Mongolia, Zhang Penghe, Qian Liangze, *Feng Eluosi riji*, *Chusai jilüe*

